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著等夫波列斯

行印店書北東

論布塞爾維的原始性

斯列波夫等著

東北書店印行

1949

目錄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一)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七)
論忠誠與老實	(一一)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一七)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二三)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二九)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三六)
全力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四四)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四八)
與羣衆聯繫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五四)
論主動和完成工作的才幹	(五九)
進一步提高黨的工作水準	(六四)
掌握政治領導的藝術	(七二)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七六)
黨組織的積極性是布爾塞維克黨強而有力的源泉	(八一)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八九)
提高黨的會議底組織和教育作用	(九五)
黨的會議是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	(九九)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

新華社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消息報譯出的。我們黨的、

軍隊的、民主政府的和人民團體的一切能讀的幹部，都應好好研究這篇文章，並且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列寧式的工作標準，來檢查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知道毛主席和我們的黨中央，是經常要求我們按照這種列寧式的標準來進行工作的，而毛主席自己的工作作風，正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最好模範。隨着人民革命戰爭的迅速發展，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必須對成萬萬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負責了；我們的每一項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紀律性，對羣衆利益缺乏熱情和責任心等官僚主義現象，都會影響甚至決定人民的苦樂、禍福和生死。向這種官僚主義作嚴肅的和反覆不斷的鬥爭，以便把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進一步，是過去一年間和今後繼續整黨、整政、整軍和三查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現在發表和學習這樣一篇文章，是有益的和適合時宜的。當然這篇文章裏所說的某些具體要求，在缺少新式交通工具的農村中是不能完全實現或者是需要降低標準的，但是即令如此，我們也必須不把這些作爲藉口，來原諒我們工作中的那些並非由此產生和並非不可能克服的一切不良現象。農村中散漫而停滯的小生產制度，乃是官僚主義蔓延的重要基礎和掩護物，這正是我們在農村環境中工作的同志們所應當警惕的；因此我們應當更加注意地與經常地來

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毛主席說：應該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和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和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正是指出了這種必要性。至於在我們同志進入城市以後，如果仍然保守着那些本來就必須堅決反對的農村式的官僚主義習慣，就更是不容許的了。

蘇維埃制度保證我國全體勞動者有最大的可能去參加國家的管理，列寧把這看作是我們國家機關底力量所在，認為這使我們國家機關底活動有不斷改進的可能。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蘇維埃機關，是為人民底利益服務的，為鞏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服務的。

列寧從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非常重視改進蘇維埃政權機關底工作，他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廣泛的勞動者階層自覺地參加蘇維埃機關底工作。

列寧非常重視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在給斯大林的短札中講到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底改組時，把下列幾項工作提到第一位，作為改組後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底迫切任務。這幾項工作就是回去調查民間的疾苦；與拖延現象作鬭爭；用革命手段與各種濫職作鬭爭。

列寧要求我們毅然決然地、迅速地、絲毫不苟地執行蘇維埃政府底法令和指示。

列寧警告說：「最小的非法行為，對蘇維埃秩序的最小的破壞，已經是一個窟子，而為勞動者底敵人所馬上利用……」

列寧在力求人們遵守革命法律時，嚴厲地同賄賂行為作鬭爭，他把這種行為叫作沙皇制度底詛咒的遺物。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人民法庭曾審理幾個受賄者底案件，法庭證明了被告有罪，却判決很輕。列寧對這樣的判決大為震怒，他在一封信中寫道：

『不把受賄者槍斃，而給了這樣開玩笑似地軟弱而輕微的判決，這對共產黨人及革命者乃是可恥的行爲。這類受賄的同志，必須交給輿論裁判，並開除出黨……』

過了幾天，列寧寫信給司法人民委員，在信上他建議道：『立刻趕快提出一個法案，規定對於賄賂（收賄、贈賄以及其他賄賂行爲等等）的懲罰，應該至少是十年監禁和十年苦役。』

列寧再三力求國家機關底精簡，要求工作上的巨大效率，並且堅決同那些以冷淡的拖延態度來代替活潑的工作作風的官僚主義者作鬭爭。

爲了要大家不僅在牽涉國家利益的場合下，而且在牽涉個人利益的場合下，都嚴格遵守革命的秩序和法令，列寧曾進行了有系統的頑強的鬭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寫信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說：

『我命令你立即把人民委員會管理處所收到的一切對政府機關及人員的控訴報告給我，其中書面的控訴限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口頭的控訴則限於四十八小時內報告。』

『管理處對這些控訴應有特別的登記，同時對管理處辦公室主任應給以縝密的監督，以執行我對這些控訴的決定。』

『檢查執行』——『檢查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及善於挑選人員，這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在工作上勝利的
基本條件。

列寧認爲確切地劃定各個工作人員的職責，確定『每個担任蘇維埃任何職務的人，爲執行一定的

明白而不含糊地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和實際工作所應有的明確責任」，是正確組織蘇維埃國家機關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論對機關也好，對個別工作人員也好，列寧始終要求獨立和負責的工作。他尖銳地斥責那種對工作無能和不願負責的現象。凡是個別工作人員及機關，企圖把自己本來可以獨立解決的問題提交給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勞動國防會議去解決，他都堅決地與之作鬥爭。

列寧向機關及個別工作人員一再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把每件事做到底，做到有實際的結果。

他再三教訓我們要為完成所委託的工作而奮鬥，教訓我們不要停留在困難面前，不要援引阻礙順利工作的表面上的理由。他說：必須善於成十次地修正，成十次地重作，但是無論如何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開始碰了壁，那就重新再來過，這樣一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列寧這樣教導我們。

他尖銳地斥責和嘲笑懶惰、粗枝大葉、對工作隨隨便便、對世上一切都喜歡沾一手，而又一事無成。列寧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精確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他以自己的例子表現了高度勞動修養底最好模範，表現了善於正確地配備工作，善於支配自己工作時間的本領。

誰也不像他那樣懂得時間底寶貴，並善於珍惜它。列寧沒有一分鐘是白白過去的，他從沒有表現過急躁，但他也從沒有拖延過。早晨他總在一定的時刻來到接見客人，主持會議，閱讀報告，並依據它們作指示，寫文章，指導當前進行的工作。而總是在正四點時回家吃飯和休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是六點或五點半，總是充滿着精力和創造的積極性，一直工作到深夜。

列寧不僅善於珍惜自己的時間，而且也善於珍惜別人的時間。列寧領導下的會議，不管到會者有

多少人，總是準時開會。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遲到委員底姓名，按照列寧的吩咐都登上了記錄簿，並且註明誰遲到了幾分鐘。如果無故一再遲到，列寧就斥責遲到者，警告說：再犯就登報。列寧從不使那些在指定時間來見他的人們等候他，在稀有的場合下，當他同其他先來的工作人員談論工作而不得不延遲幾分鐘時，他就在指定的時間把秘書叫來，要他去向等候的同志們道歉，請稍微等一下。

有一次在人民委員會開會的時間，列寧偶然經過彙報人的房間，看見整個房子塞滿了疲倦的人們，他們坐在烟霧迷濛中，有些在下棋，有些在看報，等着叫到會上去。

列寧馬上對秘書作了一系列具體的指示，要他排好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不僅如此，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他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一個書面的指示，要他週密地排好一個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他寫道：

「現在彙報人一般總要等幾個鐘頭才被召集與會。這是醜態和野蠻。」

必須做到使彙報人在一個一定的鐘點被召集。」

列寧所主持的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會議，都是在標本式的肅靜和全體出席者聚精會神之下進行的。這些會議對於蘇維埃機關底實際領導者，乃是真正的政治教育學校。

列寧在主持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這些會議時，總是盡力使討論簡短，使發言者講話明白而且扼要。會議上的長篇大論，列寧認為是無謂地浪費時間。

列寧也批評和責難長篇的書面報告。

對於這樣的報告，列寧平常是從後邊，從實際的建議看起，如果發見這些建議是實事求是的，他才把整個報告看完。

不管他所相負的國家事業多麼巨大，列寧總找得出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簡單的和細小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逝世第一週年紀念日，發表於『工人報』的一封信上，指出了列寧底這個卓越的特點。他寫道：『從來也不拒絕細小的工作，因為小事是大事的根——這就是列寧底重要遺訓之一。』

列寧把他自己的指示、要求、個人例子，同工作上的有修養的習慣和態度結合在一起。他慣於實事求是地和獨立地解決問題，慣於對所執行的工作負責，慣於把政府所通過的決議與法令確切和恰當地付諸實施，同時在蘇維埃政權機關工作中樹立起革命的紀律和秩序。他耐心而又頑強地鍛鍊了一批新型的國家工作人員。

列寧在其寫於重病時期（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月間）的最後兩篇文章裏，再度專門論述創立模範的國家機關的問題。列寧在『寧缺毋濫』這篇文章裏指示道：

『我們無論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使得科學在我們這裏不再是死板的教條和時髦的漂亮話（用不着掩飾它，在我們這裏却常常是如此），使得科學實際地化爲血肉，完全而且真正地變成生活底組成因素。』

自從列寧寫下這些卓越的話之後，已經過去二十餘年了。我們偉大祖國底國家機關，在這個期間是大大地增長了它的工作範圍，是更加複雜了，更加艱巨了，更加多種多樣了。

蘇維埃機關勝利地執行了它在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中所相負的各項任務。

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時期，表現了特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和效率，我們各個經濟的和行政的人民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在戰爭日子裏進行了巨大而又困難的組織工作，並且保證了紅軍爲粉碎敵人所需要的一切。

現在在愛國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新的和平建設時期，我們國家面前出現了新的巨大的任務，這就對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底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說：

「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更爲重要的任務了，這個勝利是我們在不屈不撓的鬭爭中所取得的。這個勝利爲我們國家新的偉大的繁盛，爲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之進一步提高開闢了道路。在我們面前展開社會主義建設如此規模宏偉的遠景，以及蘇聯力量如此巨大增漲的可能性，過去從來還不曾有過。」

爲了執行這些任務，需要進一步改進蘇聯機關底工作，使得它在新的和平條件下，也工作得「像一個好的時鐘一樣合拍而且準確」（斯大林）。

（齊生譯，曹葆華校）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 領導的基本方法

——蘇聯真理報社論——

正確的政策是勝利的泉源，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勝利的本身。勝利不是自己會來

判的，必須加以組織，加以爭取。

斯大林同志對於政策路線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作出了典型的定義。他說：『在製定正確的路線之後，對問題已作出正確的決議之後，事情的成敗即決定於組織工作，人員的正確選擇以及對各個領導機關執行程度的檢查。否則，黨的正确路線與決議即會遭受嚴重的損害。不僅如此，在製定正確的政策路線之後，組織工作即將決定一切，就是政策路線本身的命運——成功或失敗——亦不例外。』布爾塞維克政策之所以能獲得連續的勝利，是因為黨經常以全部力量進行組織工作，以保證自己政策路線之實現。我們的黨正在進行着艱巨的工作——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完成共產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

列寧與斯大林教導我們：在組織工作中最主要的是選擇幹部與檢查執行程度。黨的組織只要遵循這一指示，就可以使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方法在我國偉大建設的各方面都獲得進益。

目前所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指出：黨的組織爲了提高戰後時期的經濟與文化，正在進行着熱烈與全面的工作，發揮蘇維埃人民的偉大力量，他們的積極性與克服困難的堅定精神。黨的組織在全國人民中發起社會主義競賽，爭取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在聯共黨中央對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頒佈後，各地組織即更加注意於思想教育工作。許多黨組織都積累了對羣衆宣傳鼓動的豐富的經驗。黨的幹部強固的掌握着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

但是，許多次的代表會議也指出了黨組織在領導工作方法上存在的嚴重的缺點。仍然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只注意於開會，準備決議與製成決議。而在決議一經製成之後，他們往往就會把這些決議忘得一乾二淨。製成的決議在實踐中會怎樣，所能實現的程度如何，是否所有的機構都已行動起

來，遇到有何種困難，需要採取何種補充措施以保證事情的順利進行——對於所有這些都不給以應有的注意。例如，乞卡洛夫州的黨代表會議指出：州黨委與某些區黨委減弱了對自己決議的執行程度的檢查。州黨委與區黨委對於決議的執行只倚靠着自己小團體的活動，未能發動黨的幹部與蘇維埃幹部以及廣大勞動羣衆積極參加工作。在萬不得已時方派遣全權代表的辦法，在這裏已成爲領導上的主要手段。日常的細密的羣衆工作，對幹部的指導等時常是被無數決議的傳達與電報的拍發取而代代之。

這樣的領導方法會造成一種錯覺，即是：黨委會如能製成大量的決議，向各地發出許多電報，就似乎能表明它在工作中確實有足够的緊張。但實際上，黨的機關正是因爲忙於這些工作而使自己不能廣泛並全面的推動事情的進程。這樣，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現有的提高全部工作的可能性。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原則要求：在製成決議之後即須計劃並製定方策以保證這一決議的執行。在一種情形下，需要派出一個或一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至現地去。在另一種情形下，則必需給以物質技術器材的援助。總而言之，組織決議的執行，這就是說要發動黨與蘇維埃的無數幹部積極工作，由他們領導廣大人民克服困難，保證以布爾塞維克的工作速度完成國家當前的任務。與幹部們一起工作，給他們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檢查的主要方面。黨委會的責任在於使工作人員們明白他們所執行的任務的實質，使他們了解用何種方法可以更好的執行決議，最好是選擇何種組織形式方能增加黨發動羣衆的力量，保證黨組織當前任務的解決。

檢查執行程度是黨組織手段中最有效的武器。但必須嚴格遵守下述數點：

第一，對執行程度的檢查必須是有系統的，而不是插曲式的。就是說，在製成決議之後，不遲疑，不等待，立即督促決議的執行。黨委會必須了解該組織的日常生活，惟有如此，它才能隨時隨地

過問並在必要時糾正工作。這樣，對執行程度的檢查方能隨時發現工作中某一段落的混亂並及時找出造成混亂的責任者。只有隨時並有系統的檢查執行程度方能預防錯誤和缺點，也只有如此，黨委會方能適時的幫助自己的地方組織。檢查執行程度乃是黨組織以布爾塞維克責任心與紀律性教育幹部的有力武器。

第二、檢查執行程度不應該由次要的工作人員負責，而應該由領導人親自動手。列寧曾要求各組織，各機關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領導下的有經驗的，得力的工作人員『控制在自己手內，用以檢查實際工作之進行』，委託『某某人，到那裏去，視察，檢查，如果事情出漏洞就要你負責……』。斯大林同志曾指示過：領導人親自檢查工作是能够使工作檢查發生效力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第三、檢查執行程度應該不只是根據形式的報告，而首先應在工作現場，根據工作的實際效果檢查之。

第四、檢查執行程度必須是客觀的，嚴格的。惟有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方能及時揭露缺點並製定糾正缺點的方法。檢查執行程度時對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能舞弊徇私。那裏發揚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風氣，那裏就會產生不負責任的情形，跟踪而來的就是對國家利益的漠不關心與不忠實。對缺點應該不是掩飾，要展開尖銳的布爾塞維克的批評，不是寬容，要用非常嚴格的態度對待它——這是使檢查執行程度收效的一個重要條件。

檢查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檢查執行程度的結果可以反映出黨委會的全部領導作風，組織黨的積極份子，全體共產黨員，廣大勞動羣衆參加工作的能力。如果要加強對工作的督促與檢查，就必須改進全部的領導工作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工作的檢查如能組織良好，就會像探照燈似的，隨時隨地照明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使官僚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暴露自己的原形。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工作中十分之九的缺陷與漏洞都是由於缺乏組織良好的工作檢查而來。無疑問的，如果有正確的工作檢查，工作中的缺陷和漏洞大都可以避免的。」

黨組織的責任是對於決議執行程度的檢查工作加以積極的改進。而決議的本身則應確實符合蘇維埃人民為執行其所担负的巨大任務的要求。這就是我國經濟，文化生活與共產主義事業建設各方面的新的勝利的前提。

(常彥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蘇聯真理報)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塞維克在其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塞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

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饒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寧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

布爾塞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的創造性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的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某伊凡諾夫負責的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

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地』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到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木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們揭發出來。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它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地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的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份，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國家所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熔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爲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塞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他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它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鐘樓看得高過國家

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要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國家完成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胆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塞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塞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的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的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為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的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鬭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

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够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賊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塞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不許可的選擇幹部的方法，誰就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工作人員的領導集體被排斥了，而代替它的却是盡力和平共處而不相互批評的親人、小家族、行幫。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担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担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爲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蟻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他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作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

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的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為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不好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的按着布爾塞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住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對執行沒有完善而熟練的有組織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的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地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塞維克對所負責任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的完成前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更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塞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塞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

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敬慕之心的人。

（齊生譯自真理報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

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的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七卷三百零七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塞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實化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目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塞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暈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楚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害瘡，但假如這個瘡開始腐爛時，就

可能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迴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以個人利益或者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事物，他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傾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悲嘆困難，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及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爲要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瘡痍，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以家庭親友的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即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

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為：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專為對付懶散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以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拖拉機站，在很長時間中都被認為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做得挺好，它底領導者受到無限的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晚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

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出」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地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為不能不受到追究。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够。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

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不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率的叱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不會研究事物底本質，不會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懂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羣衆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份子，而領導的任務恰在於團結積極份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爲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涵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爲教育的方法，因爲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人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聯共（布）烏得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爲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蓋他們的缺點，姑惜他們的自尊心。黨

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惜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是要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為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績之後，就昂頭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為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受官廳習氣影響的領導人，才是可能的。在工作中沒有原則性，對自己行為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裏，相互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把事情搞糟了。但是李四不願意批評他，不願意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能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為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多好玩。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嗎？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們！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人，假如我們為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的

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忍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契支盟員共和國的國家監察機關，在檢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缺貨、私自供給、違犯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莊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的很不好。吉爾契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却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份分給了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作人員了。還亂分了其他的物品，很大一部份已經發到供給處的分解機（製奶油用的）沒有給集體農莊的牧畜部，却落到私人的手裏去了。

由於這些原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同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作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了，同自己監督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中，領導者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爲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就是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及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够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義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思想有鍛鍊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明白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會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蘇瑛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斯列波夫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折扣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均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綫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策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利益的事情出發的。有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塞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

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們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担负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種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塞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在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錯誤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育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

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

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謀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

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用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之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於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的危險。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

建設，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永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為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地、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他便會給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便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頓煤礦』托拉斯和『卡基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犯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誠懇地指出他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塞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塞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塞維克的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

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塞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信心的損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滲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本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地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會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塞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辭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做為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出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份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份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

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在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委員們在對省委書記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塞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工作人員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有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

德林吉也夫從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為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地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地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塞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

（亞天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真理報）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一時的和倏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底幹部以及一般地工人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到，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塞維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塞維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了。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塞維主義還未成爲獨立政黨，還同孟塞維克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這樣

說：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的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鬪，決不會被這區區針刺所驚動，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短處。這些短處，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生長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把他們『黨』內的真實情況的畫圖，給我們看看吧，那怕就是稍微近似我黨第二次大會記錄那樣所給予的畫圖也罷！」（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那些以爲自我批評是一個一時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會過時的。同志們，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有爾塞維主義武庫中絕不可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塞維主義底本性、同布爾塞維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的一種武器。

有時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尙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的受敵對力量包圍的黨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爲敵人可以利用該黨本身缺點的揭露來攻擊它。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爲布爾塞維主義已經取得政權，正因爲布爾塞維克也許會因我們建設底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爲布爾塞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爲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重要。自我批評之目的，是揭露與消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只會使布爾塞維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底敵人作鬪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估計到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底這種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政黨底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

「……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它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却没有做成功。在今天以前已經滅亡了的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和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却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克服這些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不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沒有布爾塞維主義。

但是，爲要展開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克服面前的許多障礙。這裏包括羣衆底文化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的缺乏，我們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是最嚴重的障礙，也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這裏說的是在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份子。這裏說的是這些官僚主義份子專門藉我們的弱點和錯誤爲生，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如像害怕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

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樣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應該使我們懂得，反官僚主義的鬭爭是絕對必要的鬭爭，這個鬭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鬭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官僚主義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已經成了病，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的毛病了，這是因為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聯結着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如果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消除我們建設底毛病，那就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進行反對我們各種組織中的官僚主義的鬭爭。

因此，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下起來批評，自下起來監督，這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主要解毒劑。

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

「……如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鬭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種鬭爭；……」因爲，『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辦法來消滅官僚主義呢？』（『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四九六頁）。

但是爲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之中，首先是在我黨內部，展開無產階級的民主。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等於空話。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無論什麼的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自我批評，它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發展工人階級底戰鬥精神，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擴大它的力量和幫助它成爲真正的

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以把工作放着不做而去對於一切東西說長道短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了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外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恥辱。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滅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信心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信心的有生命的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類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引導到破壞黨性，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瓦解我們的經濟幹部，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空談脫化。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是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的。

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都是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黨將用一切力量 and 一切手段來反對這種『自我批評』的。

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培植黨性、強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鞏固我們的經濟幹部、武裝工人階級爲目的的。（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x

x

x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裏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的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吧。

例如，就拿黨的組織對經濟的和它的各種機關的領導來說吧。這裏是否一切都很順利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不僅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比如某種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個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為那裏能担保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恕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的普遍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只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喊聲：『對呀！』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是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並把瘡毒驅進我黨機體的內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願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清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

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它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的浪潮中前進。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鬭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當階級還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謝天謝地，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下去，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簡單地就死亡的，而是拚命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些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些新的東西在生長出來。而這些正在生長的新東西，決不是簡單的就生長的，而是大喊大叫的爭取它那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呀！』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鬭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鬭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塞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掉，反而怡然自得，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大成功，就洋洋得意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却依然存在，瘡毒還在侵入到我們黨的機體內部去。（斯大林：『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

精神上培養幹部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鬥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鬥爭裏，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的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的揭發掃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的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難道還不明白？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的更嚴肅的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的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的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的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裏廣泛的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羣衆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的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的掃除缺點。有着真正布爾塞維克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作鬭爭中來用布爾塞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的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爲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於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駭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瘡痍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幌子來把他們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的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會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

的，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慫恿互相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爲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因爲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爲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爲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實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把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裏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裏。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在討論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

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判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做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爲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竟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理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誰要是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對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夠依靠黨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夠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有的，但是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絞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諱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把他

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做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全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爲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羣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裏潛藏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羣衆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有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羣衆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

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份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的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會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彙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剖缺點，而是報告他所做的工作，引證出很多統計材料和數目字，以便製造一幅或大或小的百事如意的圖畫。這種報告在發言中給人的印象是：經濟工作者的發言是經濟問題，黨的工作者的發言是黨的問題。缺乏批評，沒有利用各個工作部門積聚的經驗，也沒有使這個經驗反映到事業中去。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遷就了個別人的自尊心，是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缺點的真正原因為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為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善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是所有其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就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

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爲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可惜得很，當着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僅僅揭發壞根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要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事，我們却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爲它是不重要的。可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認爲是突然發生的，那僅僅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工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我們也能够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出名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爲好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明缺點，沒有分寸的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人員的辦法。

布爾塞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殺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澈底的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做爲他行動的方針，他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的自尊心和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思想部門中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

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價法捷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

「衛軍」之文藝批評的錯誤問題上就是一例。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了這本小說的不可抹殺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本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爲了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塞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的檢查時，或是全盤的吹噓恭維，或是全盤的非議，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遲滯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首天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二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爲了真正的提高領導集體農莊的水平，爲了在普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澈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有些黨的工作者，在改進自己的工作第一步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鋪張、讚誦，通常隨之而來的是高枕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夫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委擴大會，稱之爲『勝利者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比這更不體面的事是聯共黨客巴爾金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糧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登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塞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的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終點，爲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

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越大，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越高，那麼就要更高的要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赦免我們的缺點，相反的，應當更堅決的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夠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門中不斷的前進。』

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掘發我們可能性和後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戰綫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够使幹部提高，能够勝利的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葉羣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黨的生活二十三期社論）

全力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目前，在許多省正進行着黨的代表會議，在深刻地討論着各地方黨機關的工作。代表會議是在發揚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下，黨的羣衆的高度積極性的情況中進行着。代表們滿意地談到戰後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成就，談到黨政工作的大大的改善。同時也布爾塞維克式的暴露出黨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機關之活動中的嚴重缺點。

由於我國過渡向和平建設的軌道，便要求各地方黨機關工作的重大轉變，要求進一步提高黨對我

們一切建設地區的領導水平。黨把鞏固各地方黨的機構，提高黨內工作的及布爾塞維克對國家和經濟事業之領導的水平，加強黨機關在羣衆中的政治和組織工作等作爲主要任務之一。這個要求的實現，是與開展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密切地聯繫着布爾塞維主義的天性和她的革命精神。

馬克思說，另外，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一切革命，也在她批評自己，批評自己的同時也使自己鞏固起來。布爾塞維主義的創始者列寧與斯大林不僅在和改良主義的鬭爭中，恢復了馬克思之批評的與革命的方法及他的唯物論辯證法，而且把它具體化了並使它向前發展了。列寧斯大林創立、教育和鍛鍊了一個黨，這是一個不知道渙散、怠惰和消極的黨。一個具有最大的積極性、堅決性和新鮮事物的感覺的黨。一個善於克服走向偉大目標——共產主義去的途中的巨大困難的黨。這樣的黨不怕亮光與批評，因爲共產黨，乃是走向共產主義勝利的上升的政黨。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發展的真正的動力，是黨手中強有力的武器。『如不能像布爾塞維克所應作的那樣、公開地誠懇地指出和暴露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那我們就是遮斷自己前進的道路。但是，我們要前進。正因爲我們要前進，我們就應該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爲重要任務之一。沒有這個就沒有前進。沒有這個就沒有發展』（斯大林）。

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蘇維埃社會主義民主的最重要特徵。蘇維埃國家的勞動羣衆，在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下展開了批評與自我批評，日益積極地參加國家的管理和經濟文化的建設。

黨以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老練的武器，反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的殘渣，並把輿論的火力指向阻礙我們前進的一切舊習氣。布爾塞維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刀鋒，是針對着黨與蘇維埃機關的工作中的缺點的，並且首先是針對着忘記黨的政治工作和對待勞動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求採取形式的官僚主義

態度的現象。

列寧——斯大林類型的政治家之堅固品質，就是善於正確運用這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堅強的武器。在揭露與糾正缺點，發現和培植新事物的才能上，在對待批評的態度上，可以檢查出我們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鍛鍊。如衆所周知，黨所培養出的大批的幹部，都是有這種高貴的品質。然而直到現在，還能遇到蔑視批評與自我批評武器的個別工作人員。他們發表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好處的言論，却惡意的對待任何提給他們的正確意見。在烏里亞諾夫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引證了幾個事實，證明市黨委會不是經常正確地進行對缺點的批評。有過這樣的事情，市委的個別工作人員在領導各種會議的時候，竟要求發言人事先交出講演稿進行檢查。在烏里亞諾夫列寧區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年青的共產黨員斯塔哈諾夫工作者格黎興同志，對區委工作的缺點作了正常的批評，這就引起市委書記巴拉巴諾夫同志的不滿，給年青的黨員以嚴厲的斥責。這樣的事實固然不多，但黨的機關不能，也沒有權利熟視無睹；它的任務是教育幹部，使他們敏銳地聽取羣衆的呼聲，關心批評的意見，勇敢地歡迎工作上的批評，不管它是提得如何的尖銳。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是教育幹部的重要方法。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如果我們想正確地教育幹部，我們就不應該害怕原則性的、勇敢的、公開與客觀的批評。沒有批評，任何組織機構都會腐朽。沒有它，任何病症都會深入膏肓。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幫助我們的人們的思想政治的成長，鼓舞他們前進，克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什麼地方缺乏批評，那裏就產生陳腐和停滯，那裏就不能前進。

祇有發揚黨內民主，才能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上正確的教育幹部。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能分割的。現在正在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好的場所之一。黨的

機關的義務，是提高會議上討論問題的水平，在會議進行時，要去掉鋪張的成份。黨的領導者的職責，是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起領導作用。作報告的黨的領導人如何提出問題，如何揭露工作中產生缺點的原因，如何批評具體的保有缺點的人，對於黨委會報告的討論有非常重大的關係。

事實說明，在某些會議上，報告人陶醉於某些獲得的成績，打算抹殺工作中的缺點，迴避批評。如在乍波洛日州黨的代表會議上，州委書記葉紐金同志盡力迴避省委個別委員工作中的缺點。在尼古拉城黨的會議上，討論中的許多發言，都是採取作經濟問題報告的形式。他們羅列很多數字和事實，却忽略了黨的政治工作的根本問題。這種發言的性質，妨礙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的展開，造成漠不關心與一團和氣的環境。

布爾塞維克的批評，是深刻的、工作上的、原則性的和行動的批評。簡單的指出和祇承認錯誤是不夠的。要暴露缺點產生的原因，同時需要糾正缺點的嚴肅的實際行動。正確的對待自我批評，這不僅是承認缺點，而主要的是在實踐中糾正它。正因為如此，考慮代表會議上和總結選舉會議上的一切批評意見和建議，歸納起來，作出實行的方法便非常重要。為開展批評而鬭爭，是迅速糾正缺點和今後提高一切黨的工作的保證。

黨的代表會議是在羣衆的政治與勞動高漲的時期，在經濟與文化建設有巨大成績的時期進行着。但是布爾塞維克不應因成績而自高自大，他們是不停留在已經獲得的成績上的。我們的成績愈大，新的前提就愈多，就愈迅速的前進，那麼工作中的要求也就愈高。黨的代表會議的結果，應該使黨的機關更加團結和善戰，更加提高自己在動員勞動人民，去完成我們偉大的領袖與導師斯大林同志，在我國祖國和黨的面前所提出的、偉大的任務中的作用。

(秋林譯自一九四八、三、十五。真理報社論)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多爾庫諾夫

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我們生活和工作在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完成，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爲更加光明的將來的前途所鼓舞着的我國勞動者們，表現了極大的主動性，及日益不斷增長着的政治的和生產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在斯塔漢諾夫運動底更高的形式中，在工業和農業各部門無數革新者底生產業績中，在蘇聯學者、文藝工作者底成就裏，都得到了自己底表現。蘇聯人民底多方面的才能是日益廣泛地展開了，因爲蘇維埃制度給我國人民底發展及創造勇氣以無限的可能。

我們底黨，是革新者底黨，革命者底黨，這個黨敢於推翻陳舊的標準，而接受新鮮和前進的事物。

顯然，一種新鮮的事物，在生活中被接受，並不是自流地、自發地，而是在緊張的、不斷的鬥爭中形成的。扶植一種新鮮的事務，以一切力量鼓舞它，給與它以一切生長和形成的條件，這便是每一個布爾塞維克底義務，尤其是每一個黨底領導人底義務。

斯大林同志把對新鮮事物的感覺，稱之爲每一個布爾塞維克工作人員底高貴品質。然而掌握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什麼意思呢？這首先就是說要善於看到未來，不是墨守成規，而是依靠那種雖然

幼小，但却在上升着的事物，這就是說，不要滿足於已經獲得的東西，而是不斷地向前進步。

有許多黨底領導人總是抱怨說：日常工作佔去了他們底全部時間，這就使他們沒有可能深思熟慮地去考慮本區、本省底發展前途問題。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種現象發生在這樣一些人們的身上，他們企圖把一切事情都自己親手去做。他們不善於配合那些在他們負責領導下的各個不同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黨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包辦一切，代替一切。他是一個政治領導者，他底責任在於把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等各機關的一切力量推動起來，給以需要的方向，並督促他們能在實踐中堅決地執行決定。只有這時，一個黨的領導人才能從瑣碎的、次要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而集中精力在那些主要的、決定本區或本省未來發展的工作之上，深思熟慮這些發展前程，去利用經濟上的可能性。

在這方面，一個區或一個省的計劃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要製定計劃，不單是只照顧到今天的任務，而且要看到明天。這就是說，在每一區的經濟發展上要執行一定的政策。計劃就是這種經濟政策的表現。那些全心全力去搞各區發展前途的黨委和省委，他們就是做得對了。

例如，去年聯共黨莫洛托夫省省委，召開了一個討論發展本省生產力問題的科學代表會議，全國著名的學者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莫洛托夫省有什麼天然寶藏可以開發？那些工廠必需首先建立起來？工程師和技術員應該按着什麼方向進行工作？諸如此類以及許許多多其它的問題，該省的工作人員都得到了必要的答覆。正因如此，黨的領導人才能夠在自己底面前，提出具體的任務，推動黨的和財經的機關去解決最急迫的問題。

向前看，這就是說，對自己已經做過的东西給以估價，但並不是把它當做固定的總結，而是把它當做向前推進運動的出發點。有些領導人，當他們給某一運動做總結時，總是忘記事情底這一重要方

而。他們通常只是把積極和消極的現象加以羅列，痛罵缺點，提出許許多多的數目字。在這裏便忘記了關於新鮮事物底生動活潑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任何一件大事中都有的。而發揚這種新鮮事物，澈底分析它底產生條件，把社會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這就是爲更形加速的，前進的運動向新的勝利之發展，建立了補充的源泉。

自然，當一個新的事物在它開始發生時，是不容易觀察出它底萌芽的。列寧在他底『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寫道：『當一個新鮮的事物剛剛出生時，舊的總是存留下來，在某些時間內，還比新生的強大，這在自然界中和社會生活中總是如此……我們必需仔細地研究新生底萌芽，極其關懷地去對待它，用一切方法幫助它底生長，並「扶育」這些幼小的萌芽。』

爲了及時發現新鮮的事物，爲其迅速的生長奠下基礎，就必需具有敏銳的感覺。有時，某一事情，在我們按其長處給以估價之前，常是經過巨大的誕生的痛苦的。那些懼怕份外的操勞和努力，慣於和平和平，按照舊秩序生活的人們，靠得住就是漠不關心新鮮事物的罪人。很自然的，這樣的工作人員對於新鮮事物的感覺是遲鈍的，他們是更多地傾向於陳舊的東西，他們早晚有變成墨守成規的人，保守主義者的危險。

就拿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工作人員做例子吧。他們成年成歲地把許許多多的寶貴建議擱置起來，而這些建議如果實現的話，就能額外地給國家以幾千普特砂糖及節省千百萬盧布的開支。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把狹隘的本位的利益置於全國利益之上，他們不但不支持這種寶貴的倡導，而且相反地，去阻礙它們。甚至於在蘇聯輿論界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之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仍然繼續存在着對待新發明拖摳不用的現象。可以設想，在這些地方墨守成規及保守主義是多麼根深蒂固。而這是

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做領導工作的人員，脫離了實際生活，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工作經驗，與羣衆的聯繫，善於從國家底要求出發去對待每一件事情，這些東西便給一個工作人員以對新鮮事物的敏銳的感覺。幾年以前，庫爾斯克省的幾個集體農莊開始採用了勞動組織之小組制。當時省委領導人常常到各區裏去，仔細傾聽集體農民的意見和他們底提議。省委決定把這些零碎的經驗普遍化起來，而且決定這個工作必須由省委來做，因爲省委和所有的區，所有的經濟的，蘇維埃的，黨的組織聯繫着，因爲正是在省委手裏牽着主要的領導綫索。

省委當時就全心全力地研究了勞動組織的小組制。在集體農莊內給每一小隊固定了經常由他們耕種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給各小組固定了由他們管理的作物：栽植作物，技術作物，茶蔬，有時還規定了種植穀類作物。勞動償付中的平均主義被消滅了，收入按每一小組所獲得的收成進行分配：獲得較高收成的集體農民小組，得到較高的報酬，而獲得較低收成的小組，則得到較低的報酬。

在研究勞動組織小組制的時候，集體農莊農民的經驗又被黨的領導人底政治經驗所支持並被導入了正確的道路。從一開頭，省委就了解不但有必要用一切方法促成新鮮事物的產生，而且要幫助它形成，生長和鞏固。省委不止一次地寫信給集體農莊主席們，集體農莊黨的書記們，村鄉地方黨的組織，小隊長們，告訴他們如何正確地組織勞動，如何採取按件工資制，如何分配收入，並如何去廢除非個人負責制及平均主義。

很可惜，並不是到處都能很注意地傾聽羣衆的呼聲，並把羣衆的經驗普遍化起來。有時們只局限於去寫些鼓勵個別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及個別單位的決定和指令，形式地給自己保了一險，以求避免

受到工作不活躍的責備，但實際上對於採用和鞏固新生事物方面，並沒有做任何工作。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不能發揚主動性，而只會停滯它，絞殺它。

我們黨的組織，在深入的利用斯塔漢諾夫運動前進形式及新的工作方式等方面，已經積蓄了巨大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說，必須每天都去幫助那些採用新的勞動方法的人們，給他們掃清被墨守成規，保守主義所阻塞了的道路。但是，只去幫助一兩個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還是不夠的。前進者底經驗必須為全體工人所享有，只有這樣，這種經驗才能獲得全民的意義。雖然如此，然而收集斯塔漢諾夫運動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普遍化，加以傳播，遠非所有的地方都做到了應有的程度。一般來說，這些進步的經驗，很快就被頌揚一番，然而並不是都能找得到其中細膩的，科學技術的根據，而這種根據恰恰能够成爲生產中的工作方法和規則。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從黨的工作本身發生的，黨的工作就是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團結勞動者爲着新的勝利而進行鬭爭。黨的活動是不能容忍定型和停滯的。創造的熱情在一個黨的工作人員來說，是固有的；他批判地估價自己底經驗，經常地查檢自己底經驗是否適合於新的任務和要求。一個具有對新鮮事物感覺之黨的工作人員，從來不漠視別人底經驗，並不以學習和掌握別人底經驗爲可恥。有些所謂「絕無錯處」的工作人員，他們認爲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向別人學習，也沒有誰值得他去學，他們把自己底眼界只局限於個人的經驗之內，把自己封鎖在自己底有限的學識的圈子裏，於是他們就老是僵在一個地方了。

當一個工作人員不斷地去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時候，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就日益鋒利和敏銳。馬列主義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胚胎中的新生事物之萌芽，並按其長處去估價它們。這種感覺是由永

遠生動活潑的，永遠發展着的馬列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在新鮮的和陳舊的，垂死的和新生的，衰老的和發展的之間的鬭爭，就組成發展過程的內容。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個布爾塞維克就能深刻地認識黨底要求，黨底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要求，就是要求我們注視生活中出現的新生的事物，就是要求我們不去依據那些陳舊、衰老的，而是依靠年青的，發展着的事物。學習馬列主義的意義，對幹部底實際活動來說，是無法估價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用預見和辯認前進事物的能力，以及爲其形成和生長創造一切條件之能力武裝着布爾塞維克。

在我們底社會裏，正在進行着新鮮事物之誕生，及其與舊的事物鬭爭之不斷的，羣衆性的過程。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摧毀衰老、落後事物的方法，就是爲培養新生、前進事物而鬭爭的方法。斯大林說：『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這個真理是純潔的，明澈的，有如泉水那樣純潔，明澈。』展開對落後的批評，責備墨守成規的份子，布爾塞維克就是給新生事物及其鞏固肅清道路。

戰事結束以後，在黨的面前，出現了新的任務。蘇聯人民正全心全意努力爲祖國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們每天都給自己底勞動方法帶來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使我們能更迅速，更有信心，更順利地向前進步。及時地發現這些新鮮的東西，維護它，使它更廣泛地傳播開來，任何時候也不滿足於自己底創造，鼓勵羣衆的創造熱情，這就是每一個黨的領導人，每一個布爾塞維克之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

（洵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眞理報）

與群眾聯繫是黨的

A·葛萊普涅夫

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真理報專論——

布爾塞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羣衆的聯繫，總關心這種聯繫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鏈鎖同千百萬勞動者聯繫着，而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裏。斯大林同志說：『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爲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聯繫。而只要是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聯繫，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塞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塞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羣衆，善於團結羣衆，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祖國戰爭的日子裏，『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的聯繫是更加密切了。』（斯大林）

布爾塞維克黨在人民羣衆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爲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塞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爲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鬪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

已合而爲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個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會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的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會號召蘇維埃農民爲最快的提高農業，爲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鬪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爲高額收穫的羣衆進軍。

激發羣衆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要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羣衆、同人民的經常的聯繫，不僅善於教育羣衆，而且善於向羣衆學習——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礎。（本小節原文不清，個別字句或有出入——編者）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爲了正確的領導，只是領導者們的一種經驗是不夠的，這種經驗是不充分的。爲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羣衆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己。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會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傾聽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的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以爲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爲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塞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拉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要。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塔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塔哈諾夫勞動方法的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羣衆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爲什麼要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動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羣衆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展羣衆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羣衆的幫助，連組織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塞維克黨把自己對羣衆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爾塞維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單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鬭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堅

固同羣衆的聯繫。

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藉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自大，脫離羣衆，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裏，事情是不能推向前進的。

什科達同志担任着奧木斯克州卡拉泰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脫離了非黨的積極份子，而且也脫離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場，來到機器拖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人員談論，不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相怎樣，他又到別處去了。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裏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州內的也是最落後的。

布爾塞維主義的領導者，應該同羣衆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其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塞維克同羣衆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着尾巴主義。相反的，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塞維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羣衆是有聯繫的，他常在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是你一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探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塞維克不需要這樣的『聯繫』。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羣衆的尾巴，而是領導他們跟着自己。他首先忠實於同羣衆的關係。他不害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照黨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同他談話，而如

果需要時——就由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益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的壞的工作，都需要批評。

黨將其同人民聯繫，建立在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羣衆的基礎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責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動與宣傳，向羣衆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意義。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指示，「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利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作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演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不在集體農場作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葛尼奇斯克區，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作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同勞動者聯繫的形式。在這裏親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心裏話，無誤地確定羣衆的情緒，立即解答羣衆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躲開勞動者的有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譴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的這類非布爾塞維克的實際。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羣衆組織的機關——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

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同羣衆的聯繫，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份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塞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在勞動者的一切羣衆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聯繫，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他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羣衆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羣衆聯繫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夠每日每時地去同羣衆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策變爲成百萬羣衆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的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少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聯繫，善於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善於領導羣衆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做羣衆的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齊生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

論主動和完成工作的才幹

斯列波夫

列寧把布爾塞維克的黨稱爲革新者的黨。它總是不斷地推翻和摒棄陳腐的事物，而對於建立起來

的和檢查過的經驗，對於傳統，却始終是慎重的。黨經常研究人生的過程，觀察新的現象，發現新的要求與新的問題，並及時予以適當的解決。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列寧——斯大林型工作人員的高貴品質。

對新鮮事物感覺的表現，就是布爾塞維主義的主動性。

衆所週知，集中領導是布爾塞維主義的最重要的原則，遵守這個原則，就是嚴守紀律，明確地與無條件的執行上級機關的決定。然而嚴肅的集中領導，不但不排斥，相反地却期待着地方的創舉和主動。

布爾塞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是要求地方組織及其領導者發揮獨立的、才幹的、精明的主動。列寧說過：「總路線的一致，在基本上，在實質上是不抵觸的，然而在『細部的工作上，在地方的特徵上，在處理工作的方法上，要能運用多樣的手法……』」。

如果一個領導者願意成爲一個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組織者，就應該發揮廣泛的主動。捷爾仁斯基說過：「實行政策的總路線，無論經濟領導政策，或是一般的政策，應當有充分的信用，要負完全責任，並且要能發揮主動。不能拘泥於『一切照辦』的嚴厲命令中。」

無論多麼詳細的一道指令也不能顧及到各地方所有的一切情形。這就是說，地方組織及其領導者應該展開普遍的獨立工作，要發揮主動，提出新問題，不能每件事情都等待上級的指示。一個政治領導者，不能藉口說沒有指示而不去做。

發揮主動——就是接受上級的指示如同出於自己的一樣，不是機械的，而是創造的對待它。人生是多樣的，複雜的。同一的指示在不同的環境下，就要變更其執行方法。活的、實際的工作能不斷地

提出新問題；即或是一個舊問題在變遷了的環境下，也要經常用新的方法解決它。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領導者的任務——在實現工作中基本方向的節省人力物力的總路線時，要從周圍的一切事物中學習觀察與分析，學習尋找最好的辦法，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布爾塞維克領導者應當吸收並利用過去經驗中的一切精華，善於在當前的具體的環境中，以創造的精神發揮積累的經驗，並且用它再來充實自己的經驗。

培養我們的幹部具有主動精神，需要提高他們對工作的責任心。列寧說過：管理和領導工作必須向一個人分工不明確的散漫性的統治，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完全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規定每個工作人員負一定工作的專責，是造成發揮主動的條件。

逃避及企圖推脫責任的畏縮鬼們，不會發揮獨立的、大胆的主動，不會推進工作的。這類人很像塞德林小說中的別列德良金，他是本着一不哼不哈一的原則做事情的。可惜，我們之中還有一些工作人員，雖然相信手創之可貴並且能帶來利益，但是總想逃避責任，不支持自下而來的創舉與主動。

在羣衆中激發創造性的主動，採納進步的創舉，可貴的發起並廣泛的普及它，精密的研究新出的萌芽並儘量幫助它們發展——這是布爾塞維主義領導者的職責。

教育幹部具有英勇的創舉和主動——就是和傲慢自大，作威作福鬪爭。驕傲自大，大吹大擂其中必將引向自安自慰，洋洋自得，馬馬虎虎，喪失警惕的許多危險道路。而停滯不前，保守頑固，盲從祖先傳統——正和它們是一道的。

布爾塞維克黨斥責以自己的過去而作威作福，停止創造性的工作，停止前進的工作人員。我們不應該忘記：只有健全的，不以工作成績為滿足的，懷着不可遏止熱情前進而不停頓的地方，才會產生

主動。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每一個蘇聯人每天都應把自己的工作做一個總結，大膽的檢查自己，批評自己的缺點，周密的思索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達到更優良的成績。一個領導者更應如此。

布爾塞維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助長前進的力量。大膽和公開的批評會幫助順利的克服工作中的困難與缺點。誰怕批評——誰就是遭人卑視的懦夫，對於他們改正缺點或是掩飾缺點都是無關重要的。列寧說過：『應該善於大膽地承認錯誤，爲的是和它作更堅強的抗爭。』

只有和羣衆，和生活聯繫密切的人才善於發揮主動。脫離羣衆的，感覺不出人生脈搏的領導者，就不善於接受某一主動，更不會指示必要的方向。一個工作人員無論在任何崗位上都必須要和人民商議，考慮他們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教導過：『領導者看事物單從一方面——從上，他們的視野是有限的。羣衆看事物，事變，單從下面，他們的視野也在一定的尺度內，也是有限的。』爲了能正確的解決問題，需要把這兩種經驗團結到一起。只有在這個時候領導才能正確無誤』（斯大林語）。

布爾塞維主義領導者必須珍重被領導人們的經驗。依靠羣衆的工作人員，會使自己的經驗加上羣衆的豐富經驗。他的指令和指示會變成洶湧的力量，因爲接受它的時候不像官僚命令，而是生活本身提示的措施。

我們不應忘掉主動是離不開實際組織工作的。最好的創舉，任何可貴的發起，如果得不到求實的、組織的工作的支持和保證的話，就會被腐化和消滅。讓我們來怎樣講那些死守着主動，而不想任何辦法來實現它，或是半途而廢的工作人員呢？我們有這類事實，而且不在少數。

舉一個例子吧！今年三月在斯莫連申市發起集體農莊建設者運動——他們必須在十月革命三十週年前完成集體農民房屋的建設。這是具體的任務。但是區領導者們除了嘴皮上字面上說說寫寫以外再

沒有做別的。譬如：羅斯拉里斯基區的領導者謝爾缶爾且夫同志和庫坡里雅諾夫同志連手指甲都沒接觸，還談什麼保證完成應諾的任務呢？此外，自從他們在集體農莊建設者區域會議上說了一些漂亮的話以後，根本就再也沒理會莊民房屋建設工作進行得如何。至於許多農莊的建築隊只在書面上存在，並不履行採取的職務，還值得可疑的嗎？

又如這麼一個事實。今春在坡爾塔瓦省發揮了很好的一種主動——決定在省內每座農莊修一架平常的瞭穀台。甚至在省委決議中都記上了：『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在省內每座農莊裏修一架瞭穀台。』然而省委工作人員並沒把工作做到底，並沒制定一個實踐的檢查，而使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這是組成布爾塞維克式領導的優良特點。布爾塞維克主義領導者的職責，是把一切工作都完成到底。

有時日常實踐工作和困難開爭時，會被外表形式和大吵大嚷給頂替。讓我們引證這麼一個例子吧！烏里揚諾甫斯克市組織爲了幫助農村，決定在市內企業中給機械拖拉機站裝備五十輛流動修理工廠。這是多麼好的發起呢！但是這一發起被非布爾塞維克的處事態度給降低了價值。直到指定的日期爲止，只裝備了十輛汽車，並且後來查明其中有一半尚未修理。吵吵嚷嚷的愛好者便把這幾輛『汽車』弄到廣場上，召來一大批人，請來了照像師、音樂隊，舉行了檢閱會……過了一些時候，又裝備了二十五輛，又舉行了一次檢閱。『檢閱』的愛好者幾乎喪失了比重的感覺，甚至有個工廠給市內街道的圍柵製了一些鐵網時，也沒放鬆照像和音樂，請問，這裏還有什麼細心的日常組織工作可談呢！

主動不能容忍表面的積極和堂皇的形式。列寧和斯大林都責備過比任何人吵鬧得更歡的人，同時也責備了把這種吵吵嚷嚷當作動力的幼稚人們。跟着主動性必需有具體的工作，並且能和我們前途上

所遇到的艱難作堅韌的搏鬥。

培養幹部具有主動精神，乃是精通馬列理論並在實際行動中能夠有創造性的發揮它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工作人員就有變為區區瑣事事務者的危險。思想鍛鍊不强的人們在工作中會喪失前途和目的。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說：他們『認真的、不停手的搖槳，他們順水穩游，但是他們不僅不知道會被水送到那去，甚至也不願知道。』斯大林同志把這種工作稱為沒有前途、沒有方向和沒有目的的工作。

馬列主義的科學給予我們確定立場，發展我們的事業的力量，指出前進的方向，對工作的信心，並鍛鍊了奔向勝利的意志。而永世不朽的共產主義意志——正是大膽創舉與主動的湧湧泉源。

我們的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卓著成就在於他們為國民經濟、文化和管理機關所有各部門都培養出領導幹部，把他們教育得具有走向勝利的意志，達到目的的頑強性和前進的熱望。我黨所造就的布爾塞維克幹部們，在自己的肩膀上担負過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困苦和愛國大戰的嚴酷考驗。他們光榮的勝任了。戰後和平發展的時期，巨大的新任務又落在我們幹部的肩上。為了順利地完成這些任務，需要他們發揮『適宜於我們人民的勇氣、主動和智慧』（斯大林語）。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烏藍汗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真理報）

進一步提高黨的工作水準

——聯共『黨的生活』雜誌一九四八年第二期社論——

蘇維埃國家已經勝利地完成了戰後五年計劃的頭兩年計劃，這就加速了我們向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運動。本年度，我國應在一切國民經濟的部門裏造成新的飛躍的進步。應在一切文化，科學的領域上取得新的成就。爲了勝利地解決提在每個黨組織面前的巨大任務，我們需要進一步鞏固地方黨的機構，進一步加強地方黨在羣衆中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進一步提高地方黨對當地政府機關和經濟機關實行真正監督與開展批評、自我批評方面的作用。

要使黨的組織工作能夠適應黨的當前任務，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要開展黨內民主和自我批評；要使各個黨組織始終走在勞動者的前面，要動員全體蘇維埃人民去完成和超過斯大林五年計劃，黨的組織就必需不斷的發揚黨員的積極性，不斷的提高他們的責任感和自覺性。黨內民主的實質就在於吸引全體黨員積極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參加製訂決議，並在實踐中執行決議。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我們了解，民主就是提高黨內羣衆的積極性和自覺性，有系統的吸引黨內羣衆參加工作，不僅僅是參加討論問題，而且還要參加到領導工作中去。』

在我們許多省份裏都曾舉行過區的黨代表大會，這些會議充分明確地證明了黨內民主的巨大力量。這些大會照例是在尖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基礎上進行的。大會揭露了地方工作中的很多缺點，使黨的組織解決了許多新的任務，並把一切最有成績的工作人員提昇到領導機關中去。最近還有許多省份（其中有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要舉行區的黨代表大會，許多省份將在二、三月召開省黨代表大會，這些會議在黨的生活中應成爲更重要的事件。大會應當作出地方黨組織及其領導機關在較長時期中的工作總結，應當指出適合於各地具體情況的，完成黨和國家當前任務的具體辦法。

各省的黨代表大會，即將在人民高度的政治積極性和勞動積極性的情況下召開。我們的工業正在

勝利的完成自己的計劃，農村經濟正日趨繁榮，像貨幣改革和廢除糧食工業品的憑券購貨制這種重大措施都已實現。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社會主義競賽正在日益廣泛的開展。不久前舉行的各地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選舉，充分的顯示了蘇維埃人民的牢不可破的精神上政治上的統一，充分顯示了人民對布爾塞維克黨的偉大信任。然而如果我們黨的代表大會不揭示出因勝利而引起的心理滿足和高枕無憂的危險性，不集中一切注意去根絕那些阻礙我們前進的工作缺點，那麼，這種黨的代表大會，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黨代大會必需在尖銳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下進行，這是進一步提高黨組織戰鬥力的最重要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在我們內外政策的各種基本問題上，黨都起了領導作用，正因如此，我們在內外政策方面才取得了很多勝利。因此，關於建黨問題，關於黨的思想水準問題，關於黨的幹部問題，關於黨在經濟建設和蘇維埃建設工作中的領導能力問題，關於黨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的比重問題，最後，關於黨的內部組織狀況問題，總之，這一切都是我們政策中的基本問題。』戰爭的結束與一切生活之過渡到和平軌道都要求我們認真的加強黨的組織工作和思想教育的工作。目前黨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就是提高黨的工作水準，並在這個基礎上提高國家和經濟事業中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水準。自然，省的黨代大會必得分出大部注意力注意省委是怎樣領導區委的，他們採取甚麼樣辦法去加強下級黨組織，黨的領導機關有着怎樣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目前，應非常尖銳的提出：必需提高黨和蘇維埃幹部的思想水準和業務水準，廣泛展開政治教育工作。如果黨組織內部的生活都能緊張活躍，都有充分深刻的思想內容，如果能嚴守黨內民主的原則，及時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如果共產黨員都被吸引到積極的黨的和社會政治的生活中去，並在一切崗位上都能起先鋒的作用，那麼，共產

黨員就會更成熟，更有修養，和更有思想鍛鍊。

黨的工作水準的提高是和黨的組織怎樣進行思想教育不能分開的，是和向潛伏在蘇維埃人民中的資本主義殘餘作澈底，不妥協鬥爭這件事不能分開的。聯共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各種著名決議就是一切地方黨組織的綱領的文件，然而，我們的某些省委，却沒有根據這個決議作出自己實際工作中必需的結論來。譬如：在這個決議之後，奇克洛夫省委的思想領導工作幾乎根本沒有改變，還是和往昔一樣的粗枝大葉；根本不深入了解宣傳工作以及該地戲劇藝術等工作的詳細情況，還是和往昔一樣，那變熱中和醉心於學習人數的統計數字，而對於教員如何教，學生學些什麼，唸些什麼，他們却毫無興趣。

加強黨內組織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是我黨在動員羣衆執行黨的路綫，提高勞動者社會主義自覺性和不斷培養蘇維埃愛國主義情緒方面達到成功的重要條件。羣衆工作——這是每個黨組織的最重要的本份和天職。巨大的國民經濟任務擺在我們蘇維埃國家面前，爲要解決這個任務必需克服許多困難。然而，我們共產黨知道這個歷來保證我們勝利的方法——就是要直接面向着羣衆，提高羣衆的積極性和社會主義的自覺性。

動員羣衆的政治工作，培養教育幹部的工作，用一切辦法來鼓勵羣衆的自動性和改革精神——這不單是黨的組織工作的組成部份之一，而是黨組織活動的根本基礎，是有決定意義的槓桿，藉助於這個槓桿，我們可以完成一切工作。但是可惜得很，某些黨的領導者，還把羣衆政治和組織工作放在次要的地位。於是對命令的盲目信任，行政工作的不良作風，領導者本身脫離羣衆的宣傳鼓動工作，共產主義青年團和職工會領導工作中的缺點，最後，對待勞動者的要求和困難所表現各種各樣的官僚主

義態度，便都由此產生了。大家都知道，社會主義競賽在我們國家是起了怎樣重大的推動作用，可是我們這裏還有很多把社會主義競賽庸俗化的事實，這是由於我們的某些黨的領導者，不了解競賽是一種羣衆運動，它是建築在最廣大羣衆的積極性和自動性高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的。這次在區的黨代大會上，有些代表在發言中甚至說道：去年某些集體農莊的工作任務都是上級製訂的，許多生產隊，生產小組和農莊莊員不僅沒有參加討論，甚至他們對自己所負擔的任務都不知道。這樣的工作態度，除了帶給我們政治損害以外是不能帶給我們任何東西的。

對於黨的領導者——首先是對於人民的組織者，經常與羣衆結合乃是必不可少的。省黨代表大會的進行，應當以堅決加強社會主義競賽中的羣衆政治工作，以提高黨的機關對人民切身需要的關心以發展勞動者的自動性和創造的積極性爲其主要目的。

布爾塞維克黨的羣衆工作，任何時候都是以動員人民力量去解決最重要的經濟任務爲目的的，凡是束縛羣衆在爭取超過經濟計劃中的自動性，凡是妨礙我們發揮我們組織的巨大潛在力的思想，黨都應該對他進行堅決的鬭爭。黨委會應以政治領導機關的工作態度對待經濟工作，而不是包辦代替蘇維埃工作者和經濟工作者；是指導他們，監督他們，而不是把自己沉溺在很多日常事務裏；是集中注意去對待首要問題，應當表現出對工作缺點的高度原則性和不妥協的精神。一個成熟的政治領導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就在於它善於看到許多工作中有決定意義的環節，和善於不斷吸取與利用新的潛在力量。

目前勞動過程的全面機械化，先進技術的採用（尤其是在建築業、採煤業和林業等部門內）都具有特殊重大的意義。而工業部門內黨的工作水平之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機械化勝利的程度、新技術

的採用，及吸取利用地方資源和潛力的程度來判定的。省的黨代表大會應當反覆檢查黨委會對各種企業工作研究的深入程度。在幣制改革之後，經濟核算，節約，和工資的正確組織等工作便被強有力的提出來了，但在這裏決不能止於一般的決定，而是要認真的了解節約問題，作出正確的經濟工作方針，並對其執行程度組織檢查。斯大林同志曾說過，對業務的無知，粗心浮氣的工作態度，都會使黨的領導或者是墮落成任何人都都不需要的一堆可笑的指令，或者是墮落到任何人任何事務都不能影響的空洞和口頭上的「領導」中去」。雖然，黨的機關已經積累了很多很好工業部門中的經驗，但是，我們仍不能不看到，我們還有相當多的形式主義的，紙上談兵的領導態度，而不是一個組織者對待事業的態度。

我們試舉斯大林格勒省委管理工業的情形來說吧，該省有半數以上的企業部門（其中包括規模宏大的工廠）沒有完成工作計劃。而省委會竟把自己局限於僅僅通過一般性決議案的工作上。僅在去年十個月的期間內，省委就通過了六個關於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工作的決議，但工廠仍是一成不變的破壞着工作計劃，黨沒有組織人民去執行決議，某些目無紀律的工作者對於決議的執行毫不注意，而我們的省委對此也沒有表現出必要的堅強不移和嚴格不苟的工作態度。

我們應當以最堅決的工作態度來掃除我們在工業領導中的缺點，應當無情的根絕那些阻撓我們的斯達哈諾夫運動的思想，那些妨礙掘發新的後備力量，採用先進技術以及加速生產發展速度的思想。為了進一步提高黨對農村經濟工作中領導的水準，也應當進行尖銳的鬭爭。在戰後發展農村經濟方面，我國已取得了初步的勝利，這些勝利形成了我們更迅速地向發展的基本條件。為此，就需要我們地方黨的機關迅速清除聯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中所揭露出的那些嚴重缺點，迅速結束那些在準備和

進行農村經濟工作上的拖延現象。去年在收穫量方面許多地區有很大差別，這件事充分說明了我們領導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能不看到某些地區的工作成績主要是靠先進的集體農莊而獲得的。我們這裏還有不少的落後的地區和集體農莊，我們的省委會，還不能經常深入到每一個地區去，還不能使全部區委都深刻地滲入到農村生活的細節中去，以及採取一切必需的辦法來加強我們的各個集體農莊。我們的省委會還不能保證這樣的領導。

在改善農村經濟領導工作上，我們還僅僅作了第一步，但是，心滿意足和高枕無憂的事實却已經要多少有多少了。例如：別疆斯克省幾年來才第一次的完成了糧食計劃，他們的某些領導者就已經確定的認為：現在他們已是把一切事情都能輕易辦好的萬能之師了，他們那樣的沉醉於去年的勝利裏，以致於破壞了拖拉機的修理計劃，放鬆了對集體農莊及時充分保證各種種籽的工作，和沒有關心往田地裏積雪和肥料轉運的工作。

省的黨代大會，將在春耕以前召集，所以他們應當認真製訂很好的能於完成當前一切農村經濟工作的計劃。並應預防某些區的黨代大會所已犯的錯誤，這些錯誤就是代表們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於當時的會務問題，而把大會的意義——製定較長期間的黨的組織路線這一點，大大的降低了。

某些黨委會在實際工作中的嚴重缺點是他們只進行日常工作，而忽略了組織經濟的基本任務——鞏固勞動合作社。如果勞動合作社問題能够正確解決，那就能够保證我們的發展前途，使我們有可能充分地、最合理地使用集體農莊的生產力，和增加集體農莊的財富。集體農莊和國家的利益要求這種勞動合作社的經濟，得到全面的發展。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我們不發展公共牧畜業，就不能鞏固集體農莊，然而很多黨的組織，對於這個對國家和集體農莊本身迫切、重要的問題，還沒有給以應有的注

意，這絕不是唯一的例子，此外還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爲了充分的掌握發展農業經濟的動力，爲了發揮我們集體農莊的一切後備力量，我們黨的組織還須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省黨代表大會應當指出幾年後農村經濟發展的具體前途。應當進行一切工作，以便爭取農村經濟部門中的五年計劃之四年完成。

行將召開的省黨代表大會的使命，就是要在一切改善黨的組織工作中起其重大作用，這就責成各個省委保證仔細的進行大會的準備工作，要特別注意怎樣使工作報告內容豐富和問題尖銳，要作出詳細工作情況的分析，揭露工作缺點和產生缺點的根源，並規定今後的工作任務。斯大林同志曾指示我們說：『黨內羣衆，在積極分子會上，在黨的各種代表會上，審查自己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的報告，看他們對自己缺點的批評精神，最後看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是否被選舉到領導機關中去。』在省黨代表會上應當造成一種空氣，使代表們能够全面討論省委的工作報告，和展開尖銳的原則的批評。大會應當把堅強的布爾塞維克們，把完全忠實於列寧、斯大林偉大事業的人，把在執行黨的當前任務的鬭爭裏表現了堅忍不拔和有明確原則的人員，把兼有黨的工作者的一切必備品質的人員，選舉到黨的領導機關中去。

黨代表大會的召開，應幫助提高黨的組織工作，幫助提高黨的領導作用，和更好地動員勞動者去進行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鬭爭。

(羣譯)

掌握政治領導的藝術

——蘇聯真理報社論——

現在正在各地進行着的區、市、省黨的代表會議是我們全黨及黨的組織生活中重大的事件。這次代表會議將成爲黨的政治工作狀況，及相當於我國戰後發展之新的巨大的任務和今後勝利的建設共產主義任務而進行之黨機關之改造工作的適合事宜之檢閱。

正像黨的代表會議所證明者，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方法問題是黨的工作中新鮮的問題之一。因爲，政治領導的水平及羣衆工作的狀況，歸根到底要用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經濟工作的成績，及爲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鬥爭中的收獲而加以衡量。問題全在於：黨的組織能够，也應該以什麼樣方式，方法及手段在國家工作的所有部門中獲得成績。

黨廣泛的提出了如何猛銳的提高地方黨組織思想工作水平的問題，並增高他們的積極性的問題。必須把黨的組織及黨的工作人員從不屬於本身工作範圍的經濟行政職權方面解脫出來，以便能够更好的實現對經濟機關工作的真正監督。

黨教訓黨的及蘇維埃的幹部說：經濟成績的鞏固是建築在羣衆中的廣泛而深入的政治工作之上的。布爾塞維克黨人不是叫經濟脫離政治。我們光榮的肩負着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命運之責任的布爾塞維克黨人，我們偉大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黨，決不會反對大大小小的各種經濟事業的。但

是，我們黨經常誠示黨的機關不要單方面被吸引到經濟工作中去，而要求黨的領導人及黨的組織深刻的研究經濟工作，以便他們能從政治領導的地位來對待經濟工作。黨的機關領導勞動人民之蘇維埃的、經濟的、社會組織的工作，不是包辦代替他們的工作，而相反是用盡一切方法去鞏固並加強他們在經濟及文化建設方面的組織作用。政治領導的力量正是在於他善於把自己的思想和計劃變成廣大羣衆的——而不是狹隘的小集團的物質力量。不言而喻的，政治工作領導的關鍵，正是要同人進行工作。

如果不去關心經濟工作——如不關心工業財政計劃，經濟核算，播種、收割、購糧等等工作的完成——那是不正確的，因為偉大的共產主義的建築正是由這些具體的事情而積聚起來的。但參與經濟工作之細節，並不是說把身子陷到裏面去。應該瞻望前途，昂視前程，善於把每個工廠、鑛山、集體農莊的具體事情和我們為共產主義莊嚴事業的一般的鬭爭聯繫起來。要是黨的領導者只沉陷於日常瑣碎事務中，並只是模彷彿，重複經濟工作人員的工作，勢必走向不正確的混淆職權，鬆懈經濟技術幹部的職責。要是黨的組織包辦代替經濟機關，並單方面的斤斤計較對經濟工作人員的瑣碎監督，它就勢必失掉了批評他們的能力，剝奪了自己真正進行政治監督的職能，放棄了發展經濟的基本問題。歸根結底，這將減低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及忘却黨的工作，使之走向脫離羣衆，脫離他們精神的物質的迫切要求。

關於類似這種現象的危險性，已被揭露的格麥爾夫斯基黨組織及省黨委工作中嚴重的缺點，便是一個信號。破壞了黨的政治工作配合領導經濟的布爾塞維克原則，格麥爾夫斯基省黨委放棄了庫茲巴斯鑛山的黨的組織工作及羣衆政治工作。黨的會議在低弱的思想水平上進行着，並經常和一般的生產

會議毫無二致，他們的決議在很多場合和經濟工作人員的命令和指令很難區別。有很大一部份共產黨員沒被捲入積極的黨的生活及社會活動。大部份共產黨員不努力於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在黨的組織內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展得十分不夠。

格麥爾夫斯基省委及很多庫茲巴斯的黨的組織經常是以官僚管理來代替羣衆政治工作。建築在羣衆積極自願之上的社會主義競賽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遭到了曲解。庫茲巴斯的黨不去對社會主義競賽進行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而是醉心於鋪張表面，迷惑於突擊的道路，並組織鬆懈生產組織的「五日突擊」。在很多鑛山中經常以追求個別的最高紀錄來代替廣大羣衆的競賽運動。

格麥爾夫斯基省委及其領導者忘記了布爾塞維克黨的工作人員所特有的基本品質——善於經常的關懷人，關懷幹部。他們沒有使黨的、職工會的、蘇維埃的，及經濟的組織去重視改善鑛工的物質的文化的生活的設備。他們放棄了對文化生活機關的領導，削弱了對那些供給勞動者迫切需要的機關的社會監督。庫茲巴斯工人、工程師、技術人員日常生活設備的困難，如屋舍缺乏，文化生活機關有限等，是和某些地方機關領導者對勞動者的需要所採取的漠不關心、麻木不仁的官僚主義的態度直接聯繫着的。數年來國家所撥出的建設及修理屋舍的費用沒有動用。總起來說，在庫茲巴斯，破壞了在煤炭工業中經常培養幹部的黨的最重要指令，減低了政治領導的水平，忘却了進行改造人的工作，格麥爾夫斯基省委歸根到底忽略了重大的經濟問題上的黨的影響。如像進一步發展煤炭工業的這樣基本的問題，培養堅強的幹部，建設新煤鑛，在既有的鑛山中擴大生產力，爭取新的生產水平，擴充坑道，實行採煤過程之機械化等，都被我們黨的組織置諸腦後了。削弱了對經濟機關活動的監督，減低了對待經濟領導人員的嚴肅態度。

庫茲巴斯黨的工作人員所犯的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就是如此。其他黨的組織應該接受這些錯誤的教訓。

在戰後五年計劃的第三年——有決定意義的一年，擺在我國面前的巨大任務要求地方黨的組織進一步提高政治領導的水平，並提高黨的政治工作。必須堅決地結束那種被中央所批評的對經濟部門有害的包辦代替實際工作，應該保證對經濟部門有資望的領導，而不是對日常經濟活動的瑣碎監督；加強並提高對經濟領導幹部在執行黨的及政府的重要的經濟政治指令時的監督和嚴肅性。迫切的要求黨的組織結束那種文牘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加強黨的領導幹部同基層黨組織的生動活潑的聯繫，認真的改善共產黨員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們參加社會生活及生產活動的政治積極性，保障一切黨的政治工作的提高。

經濟計劃的完成是和工人、工程師、技術幹部中間羣衆政治工作水準有直接聯繫的，並取決於後者的，取決於社會主義競賽的真正羣衆性。黨的，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及經濟機關的注意力應該集中於改善勞動者的物質文化設備。黨組織有義務嚴格監督住宅建築工作，整頓公共住宿的秩序，組織對公益部門，商店，食堂，醫藥機關，縫紉店，修補店及其他爲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各種機關工作之社會監督。作羣衆工作，關心羣衆，關心他們的思想開展，關心他們的生活條件，這就是政治工作。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堅韌不拔的掌握布爾塞維克的政治領導藝術，掌握政治工作配合生產領導的藝術。我們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全線上應該獲得也將要獲得的新的成績及新的勝利的保障也正在於此。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西 寧

——效能與遠見——

布爾塞維克的效率，乃是一個政治領導者的黨的工作人員所必要與應有的品質，沒有這種品質是不可想像的。

效率應理解為：在實際上能够實施黨的決定，及時採取實現黨的路綫的辦法。一個講究效率的組織者，應有在一定情況中指示方針的能力，應正確和不耽擱地解決問題，及時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執行國家的計劃、任務、指令。這是以工作人員的經驗、知識與政治敏感來達成的。

列寧曾經說過：黨的組織與黨的領導者的意義，在於「爲了迅速與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就要培養必需的知識，必需的經驗，以及除了知識和經驗以外的必需的政治敏感」。不言而喻，有效率地、迅速地、不耽擱地解決問題，與急躁和草率沒有任何共同之點。這種急躁，常常引到放棄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的問題，代替以次要的、偶然發生的問題，而嚴肅的組織工作代替以空洞的例行公事。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的幹部，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的時候，在全面地判定方向和全面地估計一切長短的時候，應當英明和不急躁」。

布爾塞維克的效率就是才幹。斯大林同志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清楚地替清談家的工作者，替老實與忠誠地對待蘇維埃政權，但沒有能力領導，沒有能力組織什麼的人，畫了一個像。斯大林同志論這些清談家說：「他們動員起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提出來了，他們有轉變，有進步，然而事情原封

不動。」斯大林同志當時要求把那些可以讓任何活生生的事情沉溺在滔滔不絕的演說裏的不可救藥的清談家，從領導位置上撤職。斯大林同志說過：『在講效率的工作中，沒有清談家的位置。』

我們也有在講效率的工作中之另一種類型的不可靠的領導者。這就是不敢解決任何問題的領導者。他喜歡在與急躁作鬭爭的形式底下來拖延事情，喜歡在集體領導的形式底下開會。爲了避免解決問題，他總是裝着『想一想』、『商量商量』的樣子，然而過後他自己既不想也不同別人商量。在州黨委的實際工作中有這樣的情形：爲了糾正已發現的缺點，要採取有效的辦法，但是把問題推給黨委會議，並且也沒有準備考慮問題，這種『領導』通常引起遲延，緩慢，有時還引起缺陷。

工作中的效率，要求確實的計劃，人力的正當分配，對執行情形的檢查，同被領導者的密切聯繫。如果沒有製定能够估計到主力軍與後備軍的適當計劃，沒有建立各種武裝之間的互相配合，沒有確定精確的期限，沒有委任負責人，沒有對執行之周密與不斷的檢查；那麼有成就地進行軍事行動是不可設想的。同樣的，如果沒有計劃，沒有檢查，任何經濟活動和經濟工作中的成就，都是不可想像的。在戰爭中情況變化的場合，如果指揮上不見得靈活，對計劃不加以適當的修正，那麼部隊會遭受失敗。在經濟工作中的情形，也是這樣。這裏也要求同樣的靈活性，創造性和真正的效率。

不言而喻，不僅在經濟領導的問題上，而且在黨內工作中，也要求效率。黨的機構的一切工作者，應賦有效率、敏捷、能動性。必須不拖延，不停滯地解決發生在黨委面前的問題。及時接受意見，迅速吸收共產黨員的建議，善於指導他們的活動，及時糾正工作人員——這一切是政治領導者應有的義務。

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在聽取依瓦諾夫州黨委工作報告後，曾經通過了決定，建議在黨的州

委、區委與市委、蘇維埃與經濟的機關的實際領導中，提倡講效率的工作方法。中央委員會把這個任務具體化了。什麼是講效率的方法？這就是：

及時解決問題。

不花費時間在不必要的會議上。

對通過了決定之執行，施行嚴肅的組織工作。

分配負責執行具體的委託和任務的工作人員。

依靠真正了解確切情況者來研究問題。

及時揭露與糾正黨與蘇維埃組織中工作的缺點。

對黨與政府的決定與指令的執行，進行日常的檢查。在進行農業運動時，對黨的工作者要求高度的效率。春季播種，穀物收割，穀物供應，秋季播種——這一切工作都帶着季節性質。在這裏如果缺乏效率、遲延，可以被壞全部事情。對黨的領導者，不僅要求為實行工作而定出好計劃，而且還要在情況中指示方針，在運動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作迅速的決定，熟悉當地特殊性，看到現存的困難，並採取辦法克服困難。

現在地方黨的領導者，正埋頭於完成春季的播種工作。這裏有許多迫切的、完全必要的、不可耽擱的大小事情。播種之最迅速的完成，依靠於效率、實際辦法之及時採用，執行情形之日常與時刻檢查、對發現的缺點之立刻反應。這裏黨的工作者要不惜時間和精力。

同時，正是現在而不是再晚些，應當最緊張地展開收割的準備工作。正如在冬天，就應當關心春季播種——修理拖拉機，選擇品種等等，與進行播種同時，就應當準備收割——修理聯合收割機，農

具、乾燥器、倉庫等等。

但是如果認爲領導農業可以僅限於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僅限於播種和收割，那就錯了。黨的工作者應該看得更遠，深刻地看透經濟的規律。要熟悉集體農場的經濟狀況。分析材料，不要限於平均數字，而且要歸納其有機的組成部份。要會把今天的總結與去年的、許多年的總結來比較。這樣就可以看出發展的動力和趨勢，就可以看出長短。黨的領導者可以及時干預，糾正事情，防止落後。

對於有些黨的與經濟的工作者，我們說他們是講效率的人，是『消除缺陷的專家』。當然，排除缺陷是很大的藝術，可是做到沒有缺陷，及時預防缺陷，那是更大的藝術。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不僅要求及時準備當前的運動，而且善於看得更遠。應記得斯大林同志的話：『掌舵時要看。如果什麼也看不見，等到情況使我們遭了殃，那麼這並不是領導。布爾塞維主義不是這樣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有遠見。』

我們的幹部忙碌於完成城鄉經濟計劃的龐大的、當前的、有效率的工作。這個工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只有脫離生活的人們才會蔑視它。然而同時如果完全埋頭於所謂『當前的工作』中，不理會作過的工作，不考慮工作的前途，那麼這是不可救藥的罪惡。生活不是按照一個標準前進的，日新月異，情況變化着，新的問題發生着，對新穎事物具有敏感的黨的工作者，應從此中作出適當的結論。時常我們的工作人員陷於日常的當前的事務中，陷到這樣程度，就是自己失掉了思考前途的可能性，失掉了纜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列寧論建立蘇維埃領導機關的工作的一封信上曾寫道：必須『使自己擺脫雜亂無章，這種雜亂無章會葬送我們大家，要保證自己安靜地全面思考工作的可能性』。我們黨與經濟工作者要記住列寧的這些話，這多麼重要。

完全忙碌於當前工作的人，正是因為沒有從全面去思考工作，而意外地面臨着嚴重的缺陷。這種工作者時常滿足於局部的成績，一天的成績，一個運動的成績，而無視於在整個方面正在醞釀的落後。

例如，烏克蘭一些州的一些黨的工作者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為運動而運動地、表面地、不切合經濟地、不注意經濟發展趨勢地領導農業。一般說來，農業運動進行得並不壞，彷彿是完成了計劃。然而在烏克蘭像春麥這樣重要的農作物的播種，一年一年減縮了。例如在波爾塔瓦州，春麥播種一九三七年為十三萬五千公頃，一九三八年為十萬八千五百公頃，一九三九年為九萬九千公頃，一九四〇年為九萬一千公頃。在戰後，一九四六年春麥播種大大落後於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波爾塔瓦州黨的領導者沒有分析農業經濟，沒有及時發現減縮春麥播種的有害傾向。其他的烏克蘭的工作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斯大林同志，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二月擴大會議，已指出了這一點。

遠見的藝術，也是工業領域中黨的工作者寶貴的品質。一些工業中黨的與經濟的領導者不去看明天，不關心明天，滿足於已得的，因而失掉批判地估價經濟成就的能力，雖然這些成就有時是不鞏固的。例如，有些煤礦工業的工作者的特點就是如此。大家知道，採煤的成就是由於準備工作的及時進行來決定的。有時有這樣的情形，煤礦在幾個月期間，甚至一年之內，很好完成計劃，然後「意外地」破壞了計劃，而開始採量的下降。檢查時發現了，當進行煤的開採時，經濟領導者與黨的組織不關心準備工作的進行，不看一看煤礦的明天。

這不僅指個別的煤礦，而且同樣指整個煤礦區。拿庫茲巴斯為例吧，這裏煤的開採曾經迅速增長，而在最近速度的增長猛降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庫茲巴斯是後起的區域，是在上面的礦層採煤的。爲了這個目的，規定了採礦的適當方法。然而情況變了。上面的礦層已不能供給我們所要求的

煤的數量。需要轉向下面的、更深的鑛層去。爲了這個目的，先前的舊採鑛方法往往不能復用，需要以適合於煤鑛的新條件的新方法來補充它。然而庫茲巴斯黨的組織與經濟領導者沒有預先考慮，研究和實驗這種方法。現在不得不匆匆忙忙進行這個工作。雖然現在地方組織有可能表現出應有的效率，但由於缺乏遠見而受的損失是很明顯的。

阿罕格爾州的木材工業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阿罕格爾州的黨委第一書記尼古拉也夫同志和州黨委，沒有注意本州主要的經濟部門木材工業的事務。他們很少到木材工業場和木材站去，同工作人員幾乎沒有什麼聯繫，並且不清楚木材供給準備的真實情況。脫離了木材工業場的州黨委，沒有去解決阿罕格爾州木材工業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問題：提高機械化，培養固定的工人幹部，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沒有揭發木材工業部工作的嚴重缺點。

爲完成當前計劃的鬭爭，應與解決前途問題，與預防缺陷，不均，落後配合起來。如果黨的領導者不向前看，那麼領導的效率便失掉價值。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黨組織的積極性是布爾塞維克 黨強而有力的源泉

——布爾塞維克雜誌社論——

不久以前，各省及各邊疆州底黨的會議，充分表現了黨組織底布爾塞維克的團結，思想的更加提

高及黨的組織的高度積極性。各會議底注意力集中在黨底工作的主要問題之上，集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重大的任務之上。他們動員了黨的組織繼續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為社會主義的工業及農業的新的高漲而鬪爭，開展共產黨人及一切勞動者底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

各個會議說明了黨組織中有着怎樣優秀的幹部，在黨的工作上表現自己明確理解黨的任務並善於為其實現而奮鬥的新人物怎樣迅速的變成了黨的積極份子。年老的與年青的黨的幹部的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在會議選舉黨的領導機關的成員中可以得到說明。極大部份選舉出來的省委會及邊疆州委會委員及候補委員，是第一次被提拔到黨的領導工作上的。在省委會及邊疆州委會的成份中，具有高級及中級教育程度的共產黨人的比重提高了。這反映了共產黨人一般文化水平的提高。在黨底省委會的成份中，也同樣說明了日益提高的女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在省委會及邊疆州委會的成份中，婦女的比例比較一九三八年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會議所選的省的及邊疆州的黨委會代表着工業中及農業中的進步人們，黨的、蘇維埃的及經濟部門的工作人員、蘇維埃文化的活動家。這裏，與上次黨領導機關的選舉相較，直接參加生產的共產黨員（工人及集體農民）的比重大大增加了。

徹底的黨內民主不僅表現在大會選出的黨領導機關的成份上，也表現在黨大會工作的整個性質上，表現在代表們的高度積極性上。有四百萬多個代表出席各地的這次大會這個事實，就相當的可以說明。各地的這次大會鮮明的表現了黨內民主的力量，不斷提高的黨組織的積極性。

列寧斯大林的黨是體現着最徹底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蘇維埃國家的領導力量。黨在真正民主的

基礎上來組織自己黨內的生活。集中的領導，鐵的紀律與一切黨組織的能動性及共產黨員在黨生活中的積極性是密切結合着的。

列寧——斯大林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規定了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形式。不能動搖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在建黨的過程中不斷的豐富起來的。隨着社會主義的勝利，隨着剝削階級及其在黨內代理人的被消滅，創始了發展黨內民主的極大的可能。黨領導了我國爲新的斯大林憲法的通過所標誌着的政治生活的改變；黨開始更完善的建立了在黨內生活民主集中制的基礎，更大的發展批評及自我批評，更高的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

一切黨的實際工作，過去與現在都是建立於馬列主義的思想基礎之上的：它（黨的實際工作——譯者）依憑着這個極豐富偉大的科學寶庫，斯大林同志關於黨的理論也加入了這個寶庫中。斯大林同志在與列寧主義的敵人鬭爭中，製定了極重要的黨的規章，將布爾塞維主義的組織科學更向前推進了一步，武裝了黨，以實現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

斯大林同志創立了這條原則：黨是無產階級自覺的組織，是無產階級自覺的戰鬥組織。在一九二三年斯大林在揭露黨內生活的缺點的原因時，指出必需與不正確的觀點鬭爭：『不正確的觀點以爲我們的黨好像是機關組織的系統，而不是積極思考，自覺活動的在龍虎的，破壞舊事務，創造新事務的無產階級的戰鬥的組織。』（斯大林論黨的任務）

斯大林同志發展了這樣學說，即由黨的本性所產生的黨的領導的主要方法就是說服的方法，他指出了黨內染上行政命令的方法，由行政命令的方法來代替說服的方法是如何的危險。這種代替『形成了將我黨組織——它是自覺自動的組織——變爲懸空的官衙機關的危險。』（斯大林：聯共（布）十

五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斯大林同志這個極其重要的報告實成黨的領導人用一切方法發展黨組織的能動性及自覺自動性，吸引一切共產黨員積極的參加黨的生活。

斯大林同志給了黨內民主以詳盡的定義，其具體實現及其繼續發展的條件。「我們懂得民主是提高黨員羣衆積極性及自覺的方法，是有系統的吸引黨員羣衆不僅討論問題且領導工作的方法。」（斯大林文集卷六，三九——四〇頁）黨的行動的民主構成了其特有的力量，因為吸收共產黨員去實際實現黨的決議，會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及自覺思想，會發展他們的黨的主人翁的感覺。

現在，當黨在組織及動員勞動羣衆去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及實現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逐漸過渡的時候，斯大林同志關於黨內民主的意見對於更加提高黨員羣衆的先鋒作用及其在為共產主義的實現的鬥爭中的積極性，就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了。黨組織的這種積極性現在就表現在為四年完成五年計劃的任務，為更加提高農業產量，為用一切方法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及勞動人民底共產主義教育的鬥爭中。

對於黨的實際工作來說，為斯大林同志發展了的規章，即黨員羣衆參加製定黨的決議，參加組織其完成，並參加監督這些決議完成的程度，具有着重大的意義。為了正確的領導，斯大林同志教訓我們，只有領導者一個人的經驗是不夠的，這些經驗必需由羣衆的經驗來補充。而為此，必需傾聽普通黨員的意見，傾聽羣衆的呼聲。為了檢查決議執行的程度，由上而下的監督工作人員是不夠的，需要由下而上的檢查，由被領導者檢查領導人。「黨員羣衆在活動份子會議上，在大會上，在代表大會上用聽取其報告的方法，用批評其缺點的方法，最後，用選舉或不選舉這個或那個領導同志到領導機關

中去的方法檢查領導者。」（斯大林）這種檢查證明了是與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的黨內民主不可分的，是教育幹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實現及開展黨內民主及提高黨組織積極性的事業中，黨的積極份子具有特殊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爲了正規化的整理黨的組織，爲了一切部門工作人員之間的聯繫不致斷絕，爲了他們都是爲着共同事業工作的黨的大家庭中的一員，爲了使黨有可能接受及檢查我們負責幹部的工作經驗，各種工作部門負責幹部的會議是必要的。

黨內民主已成了黨組織的有機因素，成了其日常活動不可或缺的條件。澈底地實現民主集中制保證了黨組織的高度積極性，保證了能够很好實現黨的政策和幹部迅速成長。

黨組織的積極性，鮮明的表現在偉大的愛國戰爭年代中，那時，黨動員了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社會主義的祖國，粉碎敵人。後方及前綫的黨組織以組織及教育工作團結了蘇維埃人民，提高了他們在戰爭及勞動中的英雄主義及自我犧牲精神。

在戰後時期，當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的巨大任務擺在蘇維埃人民面前的時候，要求黨的組織更加提高黨內工作的水平及對經濟及文化建設的領導工作的水平。

在軍事時期的條件之下，黨的機關常常不得不担負起管理生產的工作。軍事時期的環境常常是非如此不可。但這在某些黨的組織中產生了一些不好的現象，致使黨的工作削弱，被國家的及經濟的機關所代替了，致使行政命令的方法滲入了黨的組織的領導工作中。

黨的機關完全由經濟管理的工作中解放出來，克服行政命令的成份是提高黨底一切工作的極其重

要的條件。共產主義建設的巨大任務要求廣大勞動羣衆底創造積極性。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積極性及自覺是加速我們前進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黨在動員勞動人民的力量進行共產主義建設的時候，首先要關心到保證自己組織的高度戰鬥力，發展其中的自覺的自動性，堅決拋棄一切阻礙黨員羣衆積極性發揮的不正確領導方法。

不久以前，聯共（布）黨中央揭露了赤卡洛夫省黨委會活動中的嚴重缺點，這首先表現在黨的實際工作中的行政命令作風。赤卡洛夫省委會不依靠區的黨組織，鞏固它們，在共產黨員中，首先是積極份子中進行理論教育工作，而僅閉門造車的製作指示並機械的分發到各區去。省委會領導各區，照例總是通過區黨委會的第一書記，將其作爲一個集體領導的機關組織及檢查區黨委會的工作，很忽視積極份子的工作。省黨委會變成了向區及集體農場用種種方法派遣各種特派員的機關，這大致成了它領導各區的唯一方法。區黨委會也學着省黨委會的樣子，放棄了最基層的組織的工作而不去依靠它。區委書記們的工作僅通過集體農場主席，給他們命令及指示，而農村共產黨員及集體農莊的積極份子，則並不被吸收參加工作。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斥責了這種破壞布爾塞維克的黨組織領導原則的行動。

不正確的領導方法束縛了黨員羣衆底積極性及自動性，損害着教育共產黨員及提高其先鋒作用的事業。在許多省及邊疆州的大會上，在個別組織中存在着這種不能充分使用黨組織的創造性，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及自動性不能得到發揮的領導方法，受到尖銳的批評，這是並不奇怪的。在討論省黨委及區黨委的候選人時，工作中依靠集體的程度如何，是否注意由下面提上来的意見，怎樣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在實際中對布爾塞維克的黨的領導方法執行得如何，這些都作爲了重要的選擇條件。

布爾塞維克批評及自我批評的力量在於：它不僅揭露工作中的缺點，而且指出改正缺點的道路。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具有實事求是的性質，它生產於改善工作的熱切希望。各省及邊疆州黨大會上的批評正具有着這種性質。

布爾塞維克領導黨組織的原則，要求各省及邊疆州黨委會在自己的工作，依靠區的黨組織，有系統的提高各區黨組織的理論水平，每日都進行對黨的積極份子及一切共產黨員的布爾塞維克的教育。省黨委會的領導工作者自己應該常常到地方上去，實際幫助地方的工作人員，指導他們，給區的及基層黨組織的積極份子講演。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黨的原則，還要求區黨委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基層的黨的組織。在大會上尖銳的斥責了這種事情：區黨委在做企業及集體農場的工作時，跳過了基層組織，降低了他們的作用，而只與企業及集體農場的領導者辦事。

大會也以極大的注意力注意了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問題。近幾年來基層黨組織的數目是大大地增加了。在工廠、集體農場、機關、學校中現在計有三十萬個黨的基層組織。農村中基層組織的增加更特別顯著。在許多省份中，一半以上的集體農場都有了黨的基層組織。黨在任何時候都沒有依靠有像現在這樣廣泛的黨的基層組織。這造成了一種可能，使能更順利的進行為提高生產，為勞動人民共產主義教育的鬥爭。

區的黨委會應該具體的領導黨的基層組織，善於達到其每一個細節。許多地方的大會指出：許多區黨委會天天收到大量的指示及命令並照例的轉達下級機關，這種作風使事務主義的忙碌代替了生氣勃勃的組織者的工作，這時，黨的領導工作的主要工作，就只是對人的工作了。

話。

黨的生活中，給了我們很多的領導效率增長的例子，如果它願意吸收一切黨組織積極參加工作的

例如：近幾月來，聯共（布）黨羅斯托夫省委顯著的改善了煤礦工業的工作。在很長期間都是落後的『羅斯托夫煤礦』，開始超過了計劃，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減低了煤底成本。所以能達到這種成績是因為省委動員了廣大的積極份子進入了提高煤礦工業產量的鬭爭。提高煤產量的問題在區及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得到了討論。在許多礦廠中召開了黨的，然後是積極份子的會議。巨大的工作在礦廠黨小組的直接參與之下開展起來了。黨的力量陣容有了新的配置。結果，在礦坑中創建了許多的黨的小組。在各礦廠中，開始有計劃的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廣泛的開展着社會主義競賽。礦區的城市黨委會及區黨委會，開始正規的舉行會議，交換黨的工作底經驗。所有這一切措施，保證了煤礦工業工作的改善。

繼續提高黨組織及一切共產黨員積極性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是正確的運用集體領導的形式及廣泛的開展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許多會議指出：當黨委會的會議及積極份子的會議進行得不正常的時候，當總結報告及選舉的限期破壞了的時候，這就減低了黨的工作人員的負責的自覺性，一些領導人開始感覺到自己離黨而獨立了。各地的大會強調指出：對實現黨內民主的監督，應是經常的與嚴格的。

各地的大會指出：黨的機關常常不會利用會議。真正的集體領導完全不是以各種會議的數目為特點，而在於是否在黨的組織中創立了這樣一種環境，使有可能：不僅將領導者的經驗，且將普通共產黨員的經驗體現在黨的決議中，揭露個別工作人員的缺點並且迅速的糾正它。

關心提高共產黨員創造性的積極性，與繼續改善黨內思想教育工作，有不可分離的聯繫。思想教育工作也佔着過去這次會議的極重要的位置。幫助黨的幹部，共產黨員掌握馬克思列寧的理論，我國的經濟知識及蘇維埃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理解國際局勢問題及蘇聯的外交政策，是黨的組織的極重要的任務。愈廣泛的進行思想工作，共產黨員就會愈清楚的理解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他們就會愈積極的促其完成。

布爾塞維克黨的力量，在於其一切組織的積極性。蘇維埃的人民在黨的領導之下為共產主義的勝利進行着奮不顧身的鬥爭，而每個黨的組織應該積極的成為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的份子，光榮的完成組織及教育羣衆的任務。

(終南譯自五月三十日布爾塞維克雜誌)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朱可文

在現在正進行着的黨代表會議上，提出許多有關黨的工作方法的問題。被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問題。

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是社會的自動的組織。它的力量在於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自覺性。黨的一切工作都在黨內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黨的機關的領導工作的方法即來自於此。政治領導的方法與行政管理

工作不同，黨的領導者不是行政管理者，他首先是羣衆的組織者及教育者。他幫助黨的、蘇維埃的及經濟工作的幹部，理解他們自己的經驗，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導他們，幫助他們糾正和預防錯誤，教育他們如何組織羣衆執行黨的指示。

如果黨的組織不去認真的集體討論問題，不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黨的機關與基層組織，與廣大的黨員羣衆聯繫不夠，那它就不能真正去領導。只有黨的領導幹部在黨員面前經常感到自己是對他們負責的，只有遵行黨內民主及黨委工作制，開展自我批評，真正的政治工作幹部才能產生和發展。

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有許多集體工作的形式，保證着廣大的黨員羣衆積極參加決定問題及執行這些決議。黨委制則首先就是說集體想辦法作決議。無論怎樣有經驗的領導者，就拿省委或區委書記來說吧，僅憑他一個人的經驗和知識也不足以從各方面都考慮週到，以製訂此一或彼一問題的正確決議。斯大林同志說，個人的決定往往是，或幾乎往往是片面的決定。

只有在全體黨委委員實際參加討論和製訂計劃的條件下，正確決定問題才屬可能。黨機關的任何一個決議都應當依據多數人的經驗，它應當是集體創造的結晶。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缺少這一點，如果一個人就作決議，那我們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犯最嚴重的錯誤。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糾正他人錯誤的可能，也正因為我們能接受這些糾正，我們的決議才能逐漸地正確。』

所以某些黨的領導者們破壞黨委制決定問題的原則是不可容忍的。某一區委書記認為自己是行政管理者，他常常以個人命令和指示代替集體討論和集體決定問題。舉這樣一個例子，在列博里新黨代表會上（阿爾泰特別區）代表們說，區委書記希洛夫同志不考慮黨委委員們的意見。或者舉這樣一個

事實，烏里揚諾夫省密列吉斯區委書記傑民同志處處剝奪區黨委委員的職權，不考慮普通黨員的意見。傑民經常個人決定問題，既成事實之後再告訴其他委員。一切事情他都一把抓，他的基本工作『作風』是官僚包辦。區委委員們害怕破壞他們和第一書記的關係，默認了他的要不得的工作方法。不久前召開過的區委擴大會上將這個幹部撤消了其第一書記的職務，是完全作得正確的。

這類不理睬集體意見的黨的工作者，因而就和黨的羣衆對立起來。他們忘記了，政治領導人不是以行政權力而是以自己的威信，深思熟慮的提議去影響他人推動工作。而這是要靠處理問題的學識，善於聽取本機關團體成員的意見，說服他們，依靠他們來取得的。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同，它要求領導者要盡許多的努力，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及善於團結幹部於自己的周圍的能力。黨的工作中官僚管理除危害我們的事業以外絕無其它好處。它不是表現領導者的力量而是表現他的軟弱。

領導上的黨委制就是說一個組織的全體成員都被吸引到積極緊張的工作中來。所以黨委開會多數委員缺席，那是不能容忍的。這種降低黨委作用的事實，在基洛夫市聯共（布）莫洛托夫區黨委會已經發生了。在這裏經常開多數委員不出席的區黨委會議。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開的區黨委會議，七個委員只有三個出席。在這些會議上通過了吸收聯共（布）黨員，批准區黨委工作計劃，在勞動組合（阿爾其爾）『化學家』決定建立基層組織等這一些很重要的決議。另外一些專門問題討論會，也在多數黨委不出席的情形下召開過。在伊萬諾夫省，卡佛里洛沃巴沙德區還有比此更出奇的事，今年一月九日召開的區委會，只有兩個委員出席……就開了。實際是區委書記阿洛夫同志一個人決定了所有的問題。

用徵求黨委意見的辦法通過重要決議的作法是破壞黨委制的一種形式。例如聯共（布）摩爾達維

亞中央局用徵求意見的辦法通過了以下一些決議：『黨領導共和國發展電力化的決議』，『關於中等學校教授論理學及心理學的決議』，『關於固定共和國集體農場及拖拉機站中農業專門幹部的決議』等等。鑑定幹部往往也是徵求意見的方式。這類事實有許多其它黨的組織內也同樣存在着。

有些領導人認為，徵求意見通過決議似乎表現着領導的效能。實際上這種方法沒有任何效能，只不過是表現了對待問題的官僚事務主義態度。當然，某些無須討論的問題可以徵求意見決定，但是最重要的決議必須在集體領導的全體委員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徵求意見的辦法破壞着黨委領導制，縮小着領導集團中每個成員們的職權，削弱着他們集體工作的責任感。

集體領導就是進一步，隨時地接近黨員，傾聽下級工作人員的意見，依靠黨的羣衆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領導者的眼界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他們是從一方面，從上面，觀察問題。相反的，羣衆是從下面觀察問題。他們的眼界同樣也是有局限性的。『爲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必須結合雙方的經驗，祇有這樣，領導才會正確。』（斯大林）

各個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參加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如果黨委會及積極份子會議組織好的話，它們就能使領導人運用這些工作人員的經驗，在布爾塞維克批評的基礎上揭發缺點，給該組織的活動指出正確的方向。但是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就是如常黨委擴大會及黨的活動份子會降低到教訓領導幹部的學校的時候這就必須糾正。這些會議不是每個地方都經常召開。如聯共（布）烏茲貝克斯坦中央全會，在一九四七年僅僅開了一次。布列安斯克省伯熱采市委在去年十個月中也祇開過一次擴大會。沃洛諾克斯基區委保加爾及布列安斯克省其它區黨委的擴大會也召開的不多。在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上的嚴肅地討論問題，有時爲鋪張形式所代替，會議講台用來大演其講，而批評及自我批評則平

解無聲息。

黨委工作祇要求領導人善於聽取全體委員的意見，考慮他們的建議，勇敢地接受對自己缺點的批評。他不能認為批評指責有損自己的威信，不得把個人自尊心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斯大林同志說過：「善於集體行動，個別同志的志願準備服從全體的志願，這就是我們布爾塞維克的真正勇敢。所以，沒有這種勇敢，不善於克己（假如你願意的話）自己的自尊心並且服從集體的意志——沒有這些品質就沒有集體，就沒有集體領導，就沒有共產主義。」

黨的領導人應當成為布爾塞維克對待黨員批評及正當指責的模範。然而某些領導人對批評兵刃相加，認為它是「對個人的侮辱」，是「威信的損害」。在沃洛希洛夫省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在幹部問題上對省委書記也姆欽科同志作了嚴格的適當的批評，他在自己的發言中打擊代表，並將幹部工作亂無頭緒的責任加在下級黨的工作人員身上。新西伯利亞市委委員布拉希列夫同志不承認對自己工作的批評，而斥責發言的代表，說他們似乎「無所事事，專以批評為能事」。

也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似乎同意批評，傾聽指責，表面上準備勇敢接受批評，但在實際上，他不採取任何辦法實行那些會議上提出來的問題。這種對待集體意見的態度，其害處並不亞於直接了當的不願考慮意見。二者結果相同：降低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及其糾正錯誤的責任心。

黨委工作制度並不是說任何問題都要提到會議上解決，如果它不須要討論，也可以個別處理。在這些情形下，此一或彼一組織的領導人不要害怕担負決定問題的責任。但是必須注意，黨委工作制，集體討論並決定問題，絕不是取消，而相反地，要提倡每個委員的個人負責制。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列寧教導我們說：「……我們須要個人負責制：正如討論基本問題須要黨

委制一樣，爲了及時解決問題，爲了不推脫責任，我們同樣需要個人負責制，個人處理問題。「辦事必須嚴格分清歸誰負責，必須與對待這一問題的摸稜兩可似是而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鬭爭。

爲使黨委領導制不流於空談和紙上談兵，每個黨委必須負起委託於自己的責任，嚴肅進行執行決議的組織工作。工作中還有這樣的黨委委員，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坐下來開黨委會，參加討論問題並認爲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責任。黨委全體委員的責任乃是關懷已通過了的決議之命運，不屈不撓的爲其實現而鬭爭。

集體領導的方法是黨的工作之基礎，它是培養黨的領導幹部的最重要的辦法。黨的積極份子愈是廣泛地參與黨領導機關的經常活動，他就愈能迅速地受到布爾塞維的教育，擺在黨組織面前的任務就能愈完美的解決。破壞黨委工作制度應被視爲是束縛黨員羣衆的創造性及自動性的官僚主義的表現。

布爾塞維克黨是在牢不可破的黨內民主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的黨章規定了廣泛發揚每個黨員及候補黨員積極性的條件，最嚴格的遵行黨內民主。黨委工作制度，使我們能够正確地培養領導幹部，幫助我們不倦怠地提高黨的組織對國家的及經濟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水平。

（張天恩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真理報」）

提高黨的會議底組織和教育作用

——真理報社論——

基層黨組織的會議在一切黨內生活中佔有巨大而重要的地位。黨的會議是基層黨組織的高級機關，是以布爾塞維克黨性的精神教育共產黨員的基本方法之一。

斯大林同志在其建黨組織問題的學說中給予黨的會議及其在黨組織生活中的作用以極大的注意。斯大林同志指出：『我們黨的行動底最重要的問題，當然，除了那些急不容緩或屬軍事和外交祕密以外的問題，一定必須在黨的會議上討論。』這種討論是自由的，是實事求是的。更會提高黨員的積極性，提高他們在組織內部工作地位的責任心，教導他們把自己的日常工作與黨的總任務聯繫起來，並使黨的會議成爲一所大的有實際教育意義的學校。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教導我們的那樣，爲提高黨員羣衆的積極性，必須把對他們有興趣的問題提到他們的面前，並保障能够自由批評及認真全面討論。

黨的會議之所以具有組織作用和教育意義，是由於布爾塞維克黨建黨基本原則而來的，因爲布爾塞維克黨是具有生動活潑，豐富而深刻內容之內部生活的組織。

黨的會議底基本缺點之一，就在於某些地方黨的機關毫不照顧當地的具體條件，它們過份地從上面限制黨的會議上所應提出討論的問題，這樣一來，就壓抑了基層黨組織底創造性和積極性。

自然，有些問題應當在全省或全區的所有黨的組織內進行討論。但這些問題畢竟還是不多，一般

來說，應該在黨的會議底議事日程上去討論的問題，應都是與本部門黨組織生活有聯繫的問題。這乃是提高黨的會議底組織作用和教育意義的條件之一，這也是發揮黨員和候補黨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條件之一。

經驗證明，正是這些與本單位的生活有聯繫的問題討論得越是積極，就越能刺激全體黨員的情緒，並引起他們的參加的興趣。然而這絕不是說，在討論問題時，參加會議的人都只能局限於談自己單位範圍之內的問題。相反，問題提得愈具體，愈能接近黨員，他就愈能在更高的原則水平上進行討論，也就愈能使當地的工作與黨提出的總任務更緊密地聯繫。

遺憾的是，還有這樣一些黨的領導機關，它們認為瑣碎的監督和規定制度比發揮當地組織底主動性和自動性還要好。譬如，在頓巴斯就有過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實現在還在許多組織中存在着。

例如弗拉季米爾省亞歷山大區，該區許多基層組織的會議是在低級水平上進行的。凋萎不振，墨守成規，沒有批評及自我批評。這種現象是因為那些本來與本區的企業部門或集體農場的生活有直接聯繫的問題很少提到會議上討論而產生的。因為區黨委會擬定議事日程時，並不顧及當地具體條件，而是自己規定出哪些問題需要討論。哪些問題不需要討論。在這裏創立了這樣一種規章：既然某一問題在區黨委會會議上討論並通過了決議的話，那麼這一決議就非在所有基層黨組織的會議上討論不可。因此，在某一次區黨委例會之後，就提議各基層組織討論整個的下列五個問題：執行區黨委擴大會，關於羅曼諾夫鄉蘇維埃黨的組織決議的問題；關於執行省黨代表大會決議的問題；總結檢查集體農場的播種準備；關於赫洛波夫鄉蘇維埃黨組織領導上如何準備播種的問題；關於開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問題。

區黨委所決議的這些問題，遠非是該區所有黨的組織都有興趣的問題。因此，它們的討論，正如

所預期的一樣，進行得沒有生氣，沒有黨員充分的積極性。當然，討論這樣的決議，如像關於羅曼諾夫鄉蘇維埃黨組織的決議，能有什麼積極性呢，該決議只是一些官樣文章的詞句的堆疊，例如：「責成重建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動員全體黨員……」「舉行組長聯席會……」「加強全體人員的宣教工作……」等等。討論這樣一般化的決議不能引起黨員的關懷和積極性，並流於空洞的形式，這是不足為奇的。

駐新西伯里斯克真理報記者也報導了同樣的情況。此地某些區裏同樣十分有興趣的、過分的、不需要的及有害的去規定黨的會議，從上面決定會議的議事日程，壓抑着當地組織的主動性。有許多這樣的情形，即黨員們到了會場上才能知道議事日程，他們沒有可能預先思考問題，沒有可能把會議與當地工作聯繫起來並準備發言。所以在這些組織內的普通黨員很少上過講台講話，而經常講話的主要是那「固定的」演說家們。

在古比舍夫省的許多區死板規定黨的會議底議事日程的現象，亦達到了這樣的地步，竟然使許多下層黨的組織來不及討論省委和區委寄給他們的決議。基層黨組織的主動性被壓抑着，他們的手被束縛着。顯然的，每個組織內都有不少的問題已經成熟，它們刺激着全體黨員的情緒，無疑地，這些問題的討論一定會在高度積極性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黨組織的這種可能性被剝奪了，它們只得按時討論省委和區委的決議……。

這種事實和建黨的基本原則是矛盾的，它削弱着黨的會議底組織和教育作用，降低着黨員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及其在自己黨組織面前的責任心，並使黨的組織和黨的政治工作普遍地減弱。

如果黨的會議底議事日程不局限於關於此一或彼一領導機關照例的那些經濟工作的某種運動等

「日常問題」，如果它包括着黨組織的政治及思想教育工作中底基本問題，那麼黨的會議底教育作用就能提高。

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蘇聯人民底先鋒隊——正在領導着全體勞動者進行爲提早完成戰後五年計劃及建設共產主義的鬭爭。在這一鬭爭中每個黨的組織都豐富着自己的經驗，提出並解決着最繁雜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動員我們內部的經濟財源，則提高羣衆的政治的和勞動的積極性，與教育勞動羣衆的共產主義事業，都是緊密聯繫着的。黨的組織底會議，這是我們黨的法庭，最尖銳的最原則的問題要提到這個法庭上來，在這裏通過的決議應該反映黨員羣衆的經驗；反映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揭發阻礙我們運動前進的一切東西。這就是說，一切黨的組織底最重要的任務就在於求得繼續提高黨的會議底組織及教育作用，進一步提高會議的思想水平，更勇敢地，更尖銳地展開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而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正是我們黨手中的有力武器，它是我們走向共產主義運動的規律。

哪個黨的組織不經常開會，同時在黨員的討論會上不提出最重要的問題，哪個組織的工作就不能有成績。在這裏，不僅要召開工作間的，而且要召開全工廠的，全機關的黨組織的會議。黨的委員會和支部，若不召開全體黨員大會，那就要喪失與黨員的聯繫，並實際上放棄對黨員的監督。當黨組織的書記在例會上報告上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之執行程度時，必須是懇切的，全面的。哪裏能掌握這一法規，哪裏黨員的積極性就能提高，使他們感覺到，不僅在會議上通過決議，並且這些決議是全體黨員的法規，並把它們實現。

黨的會議之準備及進行，應當更加有助於提高全體黨員和一切黨組織之主動性和自動性，更加有助於提高他們在其所屬工作部門中的黨組織面前的責任感，及他們在爲五年計劃，爲我社會主義祖國

底更加繁榮，爲共產主義底勝利而鬪爭中的先鋒作用。

(張天恩譯自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真理報)

黨的會議是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

列寧格勒市聯共(布)黨莫斯科區區委書記班弗洛夫作

黨的會議是黨的基層組織之最高機關，同時也是布爾塞維克教育的學校。黨的會議可以從思想上武裝共產黨員，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團結性，提高黨員對組織的責任感，並可以使每個黨員感覺到，他是統一的組織中的一分子。

區黨委應認真注意籌備和進行黨的會議的問題，區黨委應發揚黨組織提問題的主動性與自動性，而不應拿上級所提出的問題去規定一切黨的會議的議事日程。若在議事日程中僅只提出上級指示的問題那就會使黨的會議的進行官僚化。

在許多組織中所進行的黨的會議，使共產黨員對下列問題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此即「列寧、斯大林關於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與生產發展的速度」，「論對勞動者的共產主義教育和反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的鬪爭」。這些會議之所以收到如此效果是因爲事前都有充分的準備。區黨委分配了很多有修養的同志作報告。

仔細的準備這些會議，就可以使這些會議變成黨組織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這些事件乃是共產黨

員所期待和最關心的。這些會議可以給黨的組織工作以重大影響，促進全國生產的高漲，提高共產黨員對自己實際工作經驗作理論的綜合研究的興趣，並在許多方面幫助提高黨員在生產與社會生活中的先鋒作用。

在會議籌備過程中車間的黨組織對共產黨員思想教育工作顯然活躍起來了。進行了小組和個別談話，組織了書報展覽會。在準備討論會，討論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在我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時，列寧肉食聯合工廠的黨員，曾讀了許多馬列主義關於這問題的古典著作，雜誌報章上關於這問題的論文。耶果羅夫車箱製造廠黨的組織曾與修養較差的黨員及候補黨員進行事先談話。在第二「無產階級勝利」鞋工廠則於全體大會前舉行廠間黨的會議。

願意在大會上發言簽名者已達八百多人，並提出七百九十個問題，這一事實證明黨員的積極性。區黨委根據此項經驗，便給各個黨組織介紹了些座談的補充題目。

討論列寧和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與生產發展速度的學說的會議，也作了縝密的準備。在黨的會議上，這個問題的討論更廣泛促進了競賽範圍，以及糾正其組織內的缺點。基洛夫「電力」工廠有組織和鄭重地開過了大會。黨委為準備大會的材料起見，曾吸引了許多熟習企業中的社會主義競賽組織的黨員參加。開會前夕刊行許多雜誌報章和牆報，組織展覽會，在圖表和橫布聯上說明工廠與個別廠間的工作情形。關於開大會及會議日程都預先通知了全體黨員。為執行會議決定，黨員還須積極進行為達到新定額和動員全體工人提前完成計劃而奮鬥。

石綿工廠為了召開黨的會議，那天工廠牆報曾出刊了一張專號。在工廠的大會禮堂內掛有標語口號，號召完成自己所擔負的任務，組織榮譽黑板報（貼有優秀的斯捷漢諾夫運動者照片）。籌備會議

時共產黨員担负着新的，更大的任務；在許多生產部門中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大大增加了。

黨員於籌備會議期間，會細心地研究了列寧和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的指示。聯共（布）許多黨員閱讀了列寧巨著『偉大的開端』，『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以及其它等等。

在炭氣化工廠，『紅色裁縫師』工廠，第一市立發電所的各個黨的組織會議上，黨員們在其發言中已會把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競賽的原理同企業的實際工作聯繫起來。

適合時宜而嚴肅的準備了工作，全體黨員羣衆都積極的參加大會工作，促進了這些大會的順利進行。這些會議幫助教育了每個黨員對企業工作和黨的組織工作高度責任感。在第一屆關於社會主義競賽大會上，區委邀請其他黨組織的書記參加，爲讓他們能够吸取優良經驗並能指出籌備及進行黨支部大會中的缺點。

大會所通過之決定對改善企業和組織競賽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列寧肉食聯合工廠根據黨員的建議爲實行合理化的人以及發明者成立了辦公室。爲了實現大會之決定，郭涅深電車庫的黨組織幫助經營者建立技術研究室和調整其工作。

區黨委根據黨員意見，召開了完成一年計劃的斯達漢諾夫工作人員會議。該會議幫助黨的領導者同本區的先進者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揭發現存缺點，且動員全體勞動者加緊克服缺點。

目前該區已有四千多工人已完成了一年的生產定額。其中有些人已完成了五年計劃的定額。在已着手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的工作的生產革新者中間，有『電力』工廠的模型製造工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郭亥洛夫同志，和『疾行』工廠的優秀斯達漢諾夫式的工作者聯共（布）候補黨員米海洛夫

斯基。最近有三百多先進的工作隊已榮膺「十月革命三十週年工作隊」光榮稱號。

不久前在這裏曾舉行了黨的會議，討論了「關於對勞動者的共產主義教育和為反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而鬭爭」的問題。根據什麼選擇這樣的會議日程呢？因為在我們中間還存在着許多這樣的現象，即有些人總企圖少給國家繳納些，而自己從國家手中多得些。還有在生產上的貪婪者，二流子以及浪費者。而部份知識份子中間直到現在尚存在着對外國事物盲目的崇拜。黨組織必須同這些過去的殘餘作堅決的鬭爭。

「疾行」工廠中除去那些奮不顧身的勞動實例外，還有部份工人（其中也有個別的共產黨員）是以非共產主義態度對待勞動的。發言者尖銳地批評黨委會及廠間黨組織在羣眾工作與政治工作中的缺點。揭發了有礙於提高黨員和非黨員政治思想工作水平的的原因。

區黨委和黨的基層組織希望每一個黨的會議要教育共產黨員，使他們感覺到組織的力量。這對於那些大部份是新黨員，而在思想上缺乏鍛鍊的黨的組織，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更加注意準備和進行黨的會議之原因所在。

但有些黨的領導者對這項工作是不認真的。我們還有不定期召開會議的事實。凡是黨組織的領導者不懂得沒有黨的會議便沒有黨的工作的地方，便經常發生這種情形。

有時也很少注意會議的準備工作。如不久前區黨委會曾取消了以舒根同志為書記的某個黨組織的會議。——因為黨員沒按時接到開會的通知，開會地點也沒有準備好，所以到規定的時間僅來了十分之一的黨員。臨開會前才準備決議草案，這一切都表現在討論會進行的不起勁和缺乏自我批評上。區黨委於指出工廠黨委的錯誤後，便責成他們從新召開會議。

或者再拿——關於會議的領導機構問題作例吧。我們時常看到老是那些黨員主持會議，作報告也是如此。比如，在焦炭瓦斯工廠所舉行的十二次會議上都是黨組織的正副書記，和廠長作報告。在列寧冷藏聯合工廠的報告者總是黨組織的書記個人發言。

個別黨的領導者有時企圖將整個會議過程提早就擬出來了：誰講哪些問題，誰主持會議，他就忘掉這種會議沒什麼益處，不會發揮黨員的積極性，只會降低自我批評水準。

區委和下級黨組織竭力想使黨會議成爲培養紀律的學校。我們要求黨的領導者一定注意黨員缺席的現象，並每次都要給這種現象以批評，讓他們了解遵守黨章的要求是基於黨的紀律之上的。

及時通知黨員，會議決定是如何實現的，也是很重要的。我們這樣作，是爲了使黨組織的書記在黨的例會上彙報上次會議決定是如何實現的，是爲的要他們召集那些未能出席大會的黨員，並通知他們關於會議的決定。一個會議當討論問題時却很積極，而通過決定時便拖延到不定的時間那是絕不容許的。當然，這樣的決定會失掉其效果和尖銳性的。

還有這樣的情形，即會議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會議上很少討論黨的生活實際問題，不同黨員談論大會的目的和任務，不引導廣大的黨員羣衆參加會議的準備工作。作報告必須不僅限於黨組織書記，廠長，而要使最廣大的黨的積極份子參加。

區黨委會應該有系統的總結會議經驗，帮助下級黨領導者選擇會議上討論的問題，介紹如何更好的籌備會議，商量決議的性質應當是怎樣的。

黨的會議是在布爾塞維克教育黨員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在大會上積極討論問題，通過決定，可以促使基本任務——提前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第二年計劃的實現。（任飛譯自真理報）

